



「九十年來家國：1919・1949・2009」  
國際學術研討會

民族主義政黨為何鎮壓民族主義運動？  
從保釣到革新保台的辯證

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間：2009年12月10-11日

地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會議論文：未得作者書面同意，請勿徵引

※Draft: Please do not cit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 民族主義政黨為何鎮壓民族主義運動？ 從保釣到革新保台的辯證

湯 志 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ctang@gate.sinica.edu.tw

## 摘要：

在國民黨以血腥的白色恐怖手段成功瓦解中共地下組織後，台獨成爲國民黨的頭號內患威脅。自 1960 年鎮壓本、外省人攜手合作的「自由中國」組黨運動以來，國民黨不但視分離主義爲不除不快的隱憂，更將其列爲打壓的首要目標。就是在保釣運動初興時，台獨與分離主義仍是朝野一致撻伐的對象。然而，隨著海外的釣運轉向統運，島內的情勢開始產生微妙的變化。爲避免回歸、統一的民族主義狂潮導致認同中共的骨牌效應，一向把民族主義掛在嘴上的國民黨這時也不得不改弦易轍，不但寬容台獨言論於一時，還動手鎮壓熱情擁抱民族主義的師生。面對原本忠貞的外省支持者可能轉而認同擁有核武的強大中國，同時在兩國模式霸權計畫下遭到差別對待的本省人又憤恨不平的雙重威脅，革新保台成爲國民黨擺脫腹背受敵狀態的唯一選擇。在國人仍無法掙脫一個中國的認識障礙，同時遭冷戰結構擱置的主權原則逐漸回復常軌的特定局勢下，立基於特定利益、以中國民族主義爲祭品的革新保台論述才能贏得普遍性的面貌。由於容許彈性的各自解讀空間，革新保台得以在害怕被中共統一的基礎上，充當團結各方立場、凝聚社會共識的黏合劑，從統、獨論述的兩面夾擊中闖出一條路，彌補官方空洞的民族主義始終未能完成的整合革命的缺陷於一時，從而能正當化國民黨的統治，有效地化解危機。

關鍵詞：革新保台、保釣、正當化、民族主義、台獨、認識障礙

## 一、序言：不同結構的匯聚與分歧

民族主義政黨鎮壓擁抱不同民族主義的運動，似乎是理所自明、毋庸贅言的事，就像擁抱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國國民黨會鎮壓台獨，而同樣擁抱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會鎮壓藏獨、疆獨和台獨一樣。不過，民族主義政黨鎮壓擁抱同一民族主義的運動，就不是那麼地理所當然，而顯得有特別的政治考量。本文企圖解釋的，便是向來提倡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國國民黨，為何會在 1970 年代初期的台灣，鎮壓當時自保釣運動以來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並嘗試從具有不同時間與節奏的諸多社會結構與事件序列的交織來探討這個問題。

就時間綿延上較為久遠、變動一般相對較為緩慢的結構層次來說，自 1648 年西伐利亞和約以來，由歐洲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系統逐漸形成奠基於主權原則（及一定意義上：民族國家）的結構。1911 年帝制到共和的政治革命，正是中國受此一結構影響、被納入現代國際政治系統過程中的一個事件。這個政治革命雖然帶動了社會上許多的變革，加快了變化的步調，但不曾改變階級結構（一般理解的社會革命），遑論實現社會革命、整體社會期望結構的革命（我所謂的社會革命），相應未能落實、兌現 Geertz 所謂「整合的革命」，覓得一新的凝聚社會的原則。<sup>1</sup>同理，1919 年以來的新文化運動雖然加深、加廣、加速了社會結構的改變，但並沒有解決「我們是誰，要過怎樣的生活」的問題，並沒有創造及鞏固一套新的社會秩序，而不過是「新國家」（時代論）與「舊民族」（本質論）長期拉鋸的一幕而已。就是 1949 年看似全面變革的共產革命，仍只是此一漫長的社會革命過程中的一環，而不是其終點。

值得注意的是，1949 年的共產革命不只是中國社會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一個事件，而是同時鑲嵌在國際政治系統的發展軌跡中。「丟掉中國」的震撼促使美國把「圍堵」的冷戰思維從歐洲擴大應用到亞洲來，接下來的冷戰中的熱戰 – 1950 年的韓戰 – 更直接催生了全球性冷戰結構。<sup>2</sup>這個意料之外的新局勢逼得以自由世界首領自居的美國一改原有靜俟塵埃落定的態度，不但積極介入台海兩岸的戰事，更強力支持國民政府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從而擱置或逆轉了國際政治系統立基於有效統治事實的主權原則的結構。由於有此逆轉，流亡來台的國民黨才可以不屑於審時度勢，考慮落地生根成立「新國家」，而是遵循「正統」的傳統華人期望結構行事，繼續堅持自己是個「舊民族」，倡言對未能實際統治的大陸擁有完整的主權。

換句話說，美蘇對抗的冷戰局勢不但讓國民黨政府獲得能令主權原則暫時失效的喘息空間，還有助於它銜接上綿延久遠的正統觀念，以此作為正當化自己統治及與匪周旋的理據。也因此，國民黨不需、也未能痛切反省自己的失敗，真誠地面對整合革命的問題，而是以空洞而無血肉的中國民族主義作為整合台灣社會與正當化自己威權統治的依據。當這種教條式的、教科書式的民族主義遇上

<sup>1</sup>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3), Chap. 9, 10。

<sup>2</sup> John W. Mason, 《冷戰》（台北：麥田，2001），第1、2章。

血有肉、具有強大情緒感染力、能動員及引發人們獻身與認同的民族主義運動(例如保釣運動)時,它的缺陷就會曝露出來。這原本不打緊,問題是國際間的敵友關係變幻無常,國際局勢雖非一瞬即逝,卻也變動地相對快速。當 1960 年代中期以來國際局勢慢慢往回復到常態主權原則結構的方向走,加上中共成功發射原子彈,晉身強權之列,這就使得提倡、擁護非官方版的中國民族主義等同於擁護向來敵對、競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致成為國民黨優先考慮鎮壓的對象。

本文考察的焦點,便是在前述的背景下,從時間上較近、綿延較短、變動也較為快速的結構層次,來探討在 1970 年代初正當化論述的競逐中,「革新保台」的路線如何得以從統、獨兩股力量與論述的夾攻中脫穎而出,成為國民黨政府化解統治與正當化危機的指導理念。當我們理解到「怕被中共統一」成為當時各方得以團結的公分母這樣的背景,理解到國民黨當年雖然在公開的、陽的一面繼續堅持統一,但私底下在陰的一面已默默擁抱中共所謂「獨台」的立場,那麼便不會對它當時的作為會感到奇怪:容忍傾向台獨的主張與勢力,反而鎮壓中國民族主義者,對跟「統一」沾得上邊的人物與勢力逕予打擊。因為儘管國民黨深知此一整肅行動不免會造成離心的效果,但認為這是確保政權當下生存必要的迫切手段。

## 二、背景：穩定表象下的暗潮洶湧

「革新保台」之得以在 1970 年代初期台灣的特定時空條件下躍居主流論述,進而影響國民黨採取「本土化」的政策,雖非無跡可尋、憑空產生的偶然,卻是個不必然如此的偶連發展。<sup>3</sup>本文企圖解釋的,正是原本只是諸選項之一的「革新保台」,如何能在論述競逐的過程中奪得領導權,變成常態的主流論述,成為統治者接受的指導理念,進而帶來怎樣的後果。

早在台灣島內的保釣運動 1971 年掀起問政參與風潮之前,《大學雜誌》便已委婉而不遺餘力地鼓吹民主與改革。1970 年 1 月,章經評論當時的選舉「與政權的取得和維護無關,嚴格說來它只是一種民意傾向的測驗」,以曲筆批評威權統治不民主,並說競選尺度的放寬雖導致「頗多令人不能習慣而且幾乎不能忍受的激動群眾的言論」,但「並未影響執政黨預期的勝利,可見先前的顧慮純屬杞憂」,「黨外人士黃信介和其助選員」之所以能用激動的言詞挑動群眾,並非群眾「知識水準低」,而是因為他們「有切身的問題尚未能解決,才暫時地把希望寄託在譁眾者身上」,藉此影射台灣並非穩定的社會。他並進而強調「以選票代替槍彈」的重要,若不趕快確立公平公正的選舉制度,未來恐怕仍只能沿著祖

---

<sup>3</sup> 關於 1970 年代初期台灣政治轉型的分析,見湯志傑,〈重探台灣的政體轉型:如何看待 1970 年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台灣社會學》,期 12 (2006),頁 141-190。關於偶連 (contingency) 與偶然 (Zufall, chance) 的區別,見湯志傑,〈勢不可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台灣社會學》,期 13 (2007),頁 74,註 4。

先古老而殘酷的流血方式繼續下去，暗示爆發武力衝突的可能。<sup>4</sup>

事實上，國民黨自敗退來台後，便一直面臨著武力革命或叛變的威脅。至少，它是如此感知自己的處境。初抵台灣時，國民黨不但害怕中共的滲透，更擔憂陌生的台人不服統治乃至意圖反抗（不論是否肇因於二二八事件），尤其畏懼台灣內部與中共呼應。因此，國民黨來台早期主要心力放在肅清源自日據與大陸兩個傳統的左翼勢力，特別是其中寄望於「新中國」者，造成今人熟知的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sup>5</sup>在這些為數眾多的案例中，雖然無辜、羅織所在皆有，但根據晚近由幾位學生自發籌組的白色恐怖訪談團隊尚未正式整理發表的結果來看，純屬嚮壁虛構的冤、錯、假案的比率其實不若以往所想的。何況，就算這些案例真是統治者羅織罪名、意圖藉此殺雞儆猴的結果，也顯示國民黨的統治並不像表面那般穩定，而是時時面對著可能顛覆其政權的威脅 – 這毋寧是威權／極權統治的常態而非例外。<sup>6</sup>

在 1955 年國民黨將中共地下組織瓦解殆盡後，雖然對其的直接武力革命威脅大減，但它感受到的仍是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事實上，不滿國民黨威權統治者，的確也所在多有，也因此我們才會繼續看到許多的政治案件。只是，相較 1950 年代確有地下組織其事來說，1960 年代被捕繫獄者更常是因言語的牢騷而措下莫須有的叛亂罪名。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自 1960 年代起，因台獨而被捕下獄的案例開始增多，逐漸成為政治案件的主流。首先是與海外台獨勢力有所瓜葛的案例，如 1961 年台灣共和黨葉呈祥等案、1963 年同心社陳智雄等案及 1965 年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地下工作委員會案，皆與廖文毅有關，顯示海外的勢力雖難介入台灣內部的發展，但對島內並非毫無聯繫管道與影響。其次，內部自發性的台獨案件同樣也增加了。除較為今人熟知，與《自由中國》有所牽連的蘇東啓案（1961 年）外，<sup>7</sup>另如 1963 年的興台會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後來更有組織化的趨勢，如鑑於新黨失敗及武力不可行，主張選舉路線但不正式成立政黨之

<sup>4</sup> 章經，〈兩次選舉給我們的啓示〉，《大學》，期25（1970），頁37-38。

<sup>5</sup> 藍博洲，《白色恐怖》（台北：揚智，1993）；裴可權，《臺共叛亂及覆亡經過記實》（台北：商務，1987）。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9），頁20、89，提及，光復初期的台灣年輕知識份子，沒有分離主義傾向，但思想上普遍左傾，因馬克思主義是日據時代知識分子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武裝。相應地，在1950年代，將「台灣再解放」與中國革命的前途結合在一起，主張日後所謂的「左統」路線，是相當自然的傾向，因為當時台灣為右派的國民黨所統治，並為「美帝」所保護 – 儘管從今日的眼光來看，當時的人如何想像、理解獨立或解放後的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其實仍充滿了模糊與曖昧。另外，早期本省知識份子的左傾向也反映在，在海外的台籍人士，尤其是台獨支持者，很少積極參與海外的保釣運動，若是早期便積極投入者，則其對馬克思理論的了解與執著程度遠超過外省籍者。見水秉和，〈保釣的歷史回顧〉，《當代》，期2（1986），頁65。

<sup>6</sup> 最近的例子是，中共盛大閱兵慶祝建國一甲子之際，下令暫時禁止販賣菜刀、小刀。

<sup>7</sup> 陳儀深，〈臺獨叛亂的虛擬與真實 – 一九六一年蘇東啓政治案件研究〉，《臺灣史研究》，卷10期1（2003），頁141-172。

1967 年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林水泉等案，以及與其有人際網絡牽連，但後來較為左傾的台灣大眾幸福黨案（又稱羅東案）。<sup>8</sup>

邁入 1970 年代後，國民黨面臨的威脅並未減少。甚至，或是鑑於體制內的和平手段仍遭鎮壓，因而導致暴力活動的再現。1970 年 1 月 3 日，因發表「台灣自救宣言」，呼籲「台灣人」與「大陸人」一同推翻蔣政權，共建民主自由的新國家而遭國民黨嚴密監視的彭明敏成功潛逃出國。1 月 15 日，台灣獨立聯盟在海外成立。2 月 8 日，台東泰源監獄的政治犯有計劃地「起義」。<sup>9</sup>4 月 24 日，時為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在紐約遭台獨聯盟成員黃文雄、鄭自財發動刺殺。10 月 12 日，台南美國新聞處被炸。1971 年 2 月 5 日，台北美商花旗銀行被炸，據說同時還有大意為「歡迎外省人參加台獨，歡迎李敖參加台獨」的傳單散發，警總則以此為理由逮捕已跟監一年的謝聰敏、魏廷朝和李敖等人。<sup>10</sup>10 月 29 日，洪惟仁等 34 人因籌組「大同主義革命軍」被捕。12 月 10 日，軍事法庭宣判李荊孫與俞棘判亂案。12 月 31 日，成大學生蔡俊軍等因成立「成大革命黨」被捕。1972 年 7 月 31 日，「台灣革命軍」島內組織炸毀樹林、岡山等地的鐵路，顛覆軍用貨車，並焚毀鐵路局台北工廠。<sup>11</sup>

同時，在 1970 年代初，「無黨籍人士所舉辦的私人政見發表會，曾數度引來場面極為浩大的群眾，第五水門、南機場、太原路、龍山寺等地區，每入夜，數千近萬的人頭，冒著嚴冬風寒細雨，傾聽政見，而少中途離場的場面」。<sup>12</sup>黨外人士藉選舉「街頭演說」所能動員的力量，看在統治的國民黨眼中，怕也不免有所憂懼。正因為國民黨自知或自覺政權不夠穩固，才不敢在 1970 年代初遭逢

---

<sup>8</sup> 林水泉等口述，曾品滄紀錄，《一九六〇年代的獨立運動：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事件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4）；林邑軒，〈內生性台獨案件的發生初探〉，未發表課堂報告（2009）。相關案例主要整理自國家安全局已解禁的檔案，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sup>9</sup>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台北市：時報文化，1999），頁 55-57；柯旗化，《臺灣監獄島》（高雄市：第一出版社，2002），頁 189-92。

<sup>10</sup> 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台北：天下文化，1988），頁 30-32。按兩次爆炸事件皆鎖定美國機構，有明顯的反帝、反美色彩，因此其台獨主張推測上或有別於海外的台獨聯盟，更可能是來自左翼的主張或承繼日據的傳統，追求列寧所謂「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意義下的台獨，至於是否主張完全或永久脫離中國，並不十分清楚。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頁 66，也說，不論戰前還是戰後的台共，皆充滿統一陣線的色彩，裡面包括不少後來主張分離主義的自決主義者。對列寧影響下特定的「民族解放」與「獨立」觀，以及日據的傳統，可參見吳叡人，〈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收入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市：新自然主義，2001），頁 43-110。

<sup>11</sup> 整理自薛化元主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I（1966-1978）》（台北市：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90）。

<sup>12</sup> 章經，〈兩次選舉給我們的啟示〉。

由外部正當性危機引發的壓力時，採取強勢的手段，而被迫以改革來回應。<sup>13</sup>

不過，在 1970 年代初的環境裡，主張民主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得進行艱困的兩面作戰，不但要反駁統治者常引以為據的民主不適合國情的說法，還必須扭轉國人因為 1960 年代青年反叛運動在美造成動亂而來的、對於民主的負面印象。像劉述先便藉著分析「民本」與「民主」的不同，以及民主的理想與實際，試圖在保守與極端的兩路夾殺下，挽救對於民主的信心。<sup>14</sup>王順則在翻譯 R. Rosenberg〈台灣的大學生與政治參與〉的譯後記中主動提及，美國政府學潮調查團的結論是，「學潮對美國社會有建設性的影響，鼓舞了青年普遍地對公眾事務做更深入的思考，而不再受少數一、二政客的操縱」。<sup>15</sup>但是，在年青世代掀起參與、問政熱潮前，《大學》也只能委婉地呼籲支持及實踐民主，例如藉〈蘇聯三個學者的宣言〉說，若不儘早民主化，「再過幾年，也許就太晚了」，<sup>16</sup>或是重刊蕭公權的文章，指「假裝民主者的罪惡畢竟比阻撓民主者要小些。因為假裝民主者還給人民以弄假成真的機會，阻撓民主者甚至把這個機會都要加以剝奪。這纔是民主最大的敵人」，<sup>17</sup>隱隱暗示人民不妨弄假成真。

### （一）統一與獨立的兩路夾擊

民主改革的論述雖也會對國民黨造成一定的壓力，但循的畢竟是在既有體制內的改革路線。從根本上挑戰國民黨統治正當性，從而對其構成最嚴重威脅的，毋寧還是二二八事件以來於海外公開宣揚、傳播，但在國內只能潛伏著、私底下流傳的統、獨論述。<sup>18</sup>在「兩個中國」的爭議始終不曾中止，而且國府的國

<sup>13</sup> 與此類似，國民黨原本絕對禁止學生示威遊行，但在保釣運動興起，發覺無法限制之後，便改採疏導的方式，錢復因此奉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及救國團主任蔣經國之命到大學演講。見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台北：天下遠見，2005），頁139。

<sup>14</sup> 劉述先，〈現代政治的歧途－民主的理想與實際〉，《大學》，期31（1970），頁3-7。

<sup>15</sup> Riki Rosenberg著，王順譯〈台灣的大學生與政治參與〉，《大學》，期35（1970），頁18-19。該譯後記最後一段在刊出時被刪去，日後才以回覆讀者來信的方式登出，其內容提及台灣的教育無法發揮輔導青年的功能，青年的「政治情緒無由疏導以至於一部份偏激的青年，走向親痛仇快的『臺獨』路線」。見王順，〈譯後記〉，《大學》，期37（1971），頁57。之所以有此波折，除了版面這個作者提及的表面因素外，我想跟議題敏感，編委會判斷政治氣氛尚不適宜更為有關。

<sup>16</sup> 金恆杰譯，〈蘇聯三個學者的宣言〉，《大學》，期35（1970），頁3-8。

<sup>17</sup> 蕭公權，〈說民主〉，《大學》，期36（1970），頁9-12。

<sup>18</sup> 由於這些論述多只私下流傳而未能檯面化，以致今人往往有早年島內並無台獨主張或統獨論爭的印象。其實，社會的複雜程度遠超過我們只能透過湊巧取得的殘存片段史料所能掌握。如果我們把觀察、分析的脈絡放大，對文本的解讀可能即有所不同。以劉大任1970年晚期於香港《新土》連載，但遲至1985年才正式成書出版的《浮游群落》（台北市：遠景）為例，他將小說的時空背景往前追溯到1960年代，鋪陳出當時在現代化派的西化傾向外，亦有左翼的統、獨取向，藉此先在的歷史脈絡來理解、詮釋日後何以會有保釣的風潮，及其發展為何如此。這雖是事後的小說虛構，但顯然不

際處境自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共核試爆成功後日益艱難的情況下，更是如此。<sup>19</sup>就在 1964 年 9 月，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因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指台灣島上的人民，既不願被國民黨、也不願被共產黨統治，而是要自己統治；國民政府既不能代表大陸的人民，也不能代表台灣的人民，而且「『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結果尚未散發前便為警總逮捕。在中共核試爆成功後，監委曹德宣在《自立晚報》發表〈掃除虛偽和不誠實〉，認為「韓戰前後，我們反對『兩個中國』。這絕對有利。因為所有西方國家認為中共是侵略國。但是如今國際形勢已經改變，法國公然承認共匪，日本、西德、加拿大、義大利…實際上等於承認共匪。而且由於最近核子試爆成功，美國的輿論也傾向改變政府的政策，承認共匪。正因如此，共匪用這個機會更強硬反對『兩個中國』。因為如今被否認的是我們」，建議改採兩個中國的政策，「絕對不可以意氣用事憤然退出聯合國」，結果遭開除黨籍的處分。<sup>20</sup>

---

全是憑空捏造，而多少有所憑據，就算不是 1960 年代的實情，至少反映了 1970 年代的情況與理解。可參考王智明，〈敘述七〇年代：離鄉、祭國、資本化〉，《文化研究》，期 5（2007），頁 19，對於張系國《昨日之怒》係以敘述的當下為起點追憶保釣，而劉的《浮游群落》則是潛進六〇年代台灣的社會情境裡期待保釣的分析。世代差異及不同的世代經驗，是我們分析時必須考慮的問題。像葉石濤早年無緣接觸前輩台人的反抗傳統，純依個人對唯美與浪漫的偏好而奉西川滿為自己的文學楷模，但到台北工作結識台人先輩作家後，其文學思想便開始轉向批判的寫實主義。此外，葉氏在戰後不但親遭牢獄之災，而且自學生時代即與日後主張台獨的王育德一家人熟識，也曾向楊遠請益關於台共的問題，並與親歷泰源監獄起義的柯旗化相友（見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第一、四章）。因此我們雖不易確認葉氏在 1970 年代是否主張、支持台獨，但可以肯定他對台獨絕非不識之無，與楊青矗等對檯面下的統獨鬥爭瞭然無知，直到美麗島事件政治上才有所啓蒙的年輕世代不可同日而語。也因此，同樣有牢獄經驗、了解相關背景、對紅（左[統]）、白（[台]獨）、粉（左獨）等區分極為敏感的陳映真，才會偏離鄉土文學論戰原來的軸，公開宣稱葉氏主張分離主義。至於葉氏本人當年及之後的一些說詞，除了常為人指出的自我保護的問題外，我認為也要考慮政治與文學場域的區別，以及當年時空環境下葉本人信奉或追隨的文學典範為何等問題。因為支持台獨是一回事，在小說中主張台獨是另一回事，用浪漫、寫實、魔幻寫實…的筆調或風格來寫又是另一回事。

<sup>19</sup> 在中共成功發展核武及人造衛星的背景下，1966 年，美國「亞洲學會」198 名學人即公開登報要求政府與中共公開談判交換代表、終止禁運、控制原子武器等議題。1968 年底，「對外關係協會」亦致函總統當選人尼克森，建議新政府找信得過的人與中共領導人秘密談判，施壓臺灣自外島撤出，不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並給予其安理會席次，見李河清，〈美國對中共新態度及其影響〉，《大學》，期 50（1972），頁 36。

<sup>20</sup> 王育德，《苦悶的台灣》（台北市：鄭南榕發行，1979），頁 199-200、212-216；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頁 148-160。相對地，日據時期民族運動的前輩蔡培火則在 1966 年 11 月 9 日的《自立晚報》上撰文說，「臺灣和大陸是絕對不能分開的，就好像手足不能與軀體分開一樣…夢想臺灣獨立…是頭腦混沌不清的…今天，少數盲目無知的人窮嚷著獨立…即使獨立成功了，那千千萬萬的大陸兄弟一定父傳子子傳孫永遠恨死臺灣同胞的。有一天，等

面對日益惡劣的國際局勢，國民黨並非全無作為，只是並非調整外交政策及進行內部改革，而是把心力放在對內的宣傳戰上。在內部「左統」勢力業經白色恐怖掃除殆盡的情況下，國民黨優先要對付的是台獨勢力與台獨論述。1965年5月14日，在國民黨千方百計策反誘拐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自日返台投誠，聲明放棄台獨。或許是認為台獨陣營此後行將瓦解，再不足為患，國民黨一反以往封鎖台獨相關消息的做法，就此大做宣傳，使新聞熱度持續一個月之久。<sup>21</sup>

不過，這種象徵鬥爭的手法雖然或許可以爭取到一般平民百姓的支持，卻不見的能說服具思辨能力的知識份子，更無法抗拒國際局勢的演變。1971年1月，就在海外保釣興起不久，《大學》剛與小蔣結盟，進行改組後，鄧維楨呼籲當局認真考慮國內外已不少人提出的彈性外交主張，對許多國家熱中安排的「兩個中國」席位採取曖昧的態度。<sup>22</sup>儘管鄧文不曾明言支持兩個中國，而只說應以模糊立場謀求對己的最大利益，仍立刻惹來了當時在政大客座的丘宏達的不同意見：「外人對我們國家前途作做種種安排，不論是『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託管』，『公民投票』或『中共的自治省』，其動機都是存心不良，存著試試看的想法，試成了（這種可能性甚小）可以達到分裂中國的目的；試壞了，臺灣大亂被中共「解放」，他們也無所謂，有不少還認為這樣就可以解決『中國問題』，名正言順與中共『建立正常關係』…如果有人想利用政府求言的機會，喪心病狂地提出破壞祖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的謬論，政府必須依法予以嚴懲，絕對不要怕外人的干涉…早日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sup>23</sup>

連在美國大學教書，頂著國際法專家的頭銜，因此相當程度上可憑其專業權威主導《大學》對於國家前途問題看法的丘宏達都無法跳出「一個中國」的認識障礙，<sup>24</sup>接受主權只局限於台澎金馬、獨立的中華民國，而還是從傳統中國一

---

到中國復興強大了，不用說，第一個目標一定先把臺灣收回去」。見丘宏達，〈我國退出聯合國後所面臨的問題〉，《大學》，期47（1971），頁16。這顯示即便在1960年代，對台獨已有某程度的公開討論，而非統治者能完全消音的議題。而關於媒體的研究已指出，控制議題的設定遠比控制人們對特定議題持支持或反對的態度要來的關鍵。

<sup>21</sup> 李世傑，《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廖文毅投降始末》（台北市：自由時代，1988）。國民黨本身的文宣可見海外出版社於1965年編印的《祖國的召喚：廖文毅幡然來歸記》，書內頁附有國民黨中委會三組如下的說明字條：「本書係專供寄發日本美國地區僑胞及各地區留學生參閱之用在國內不另散發」。

<sup>22</sup> 鄧維楨，〈「野人閒話」專欄〉，《大學》，期37（1971），頁59。

<sup>23</sup> 丘宏達，〈對於國是的幾點意見〉，《大學》，期38（1971），頁17。又根據陳少廷、陳達弘，《政治蒼蠅的嘴臉：駁斥張俊宏的謬言》（台北：環宇，1977），頁6，《大學》之所以與國民黨中央黨部發生聯繫，得歸功於丘宏達的努力。

<sup>24</sup> 認識障礙係採用自Bachelard的概念，可與後面註132提及的Bourdieu的常識概念互相參照。見Gaston Bachelard, *Epistemologie* (Frankfurt a.M.: Fischer, 1993); Mary McAllester Jones, *Gaston Bachelard, Subversive Humanist: Texts and Readings*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統的正統觀念來立論，力主「一個中國」是唯一及最佳的策略，那麼長久以來國府會墨守一個中國的立場而不知與時俱變，自不足怪。<sup>25</sup>事實上，丘宏達在討論釣魚台問題時，只列舉事實及法條上於我有利的細節，而從未向讀者介紹現代國際法體系的邏輯與原則，更未在此基礎上就國際局勢現況討論我方的較佳策略。

26

到退出聯合國後，丘才表示「雙重代表權」在策略的運用上似乎有其必要。在安撫國人「國家安全主要靠我們自己的實力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不靠聯合國」之餘，他依然嚴詞批評「光復大陸甚為困難，不如只求自保」是苟安與天真的想法，「**實行『一中一臺』的內政與外交政策…是不通與最危險的理論**」。首先中共絕不接受，「**不論是以臺灣或中華民國的名義，我國都無法留下與中共『並存』**」，一旦「一中一臺」正式成立，我們與中共的鬥爭就變了質，中共可以討伐「漢奸」為名，號召海內外華人支持，來收復「失土」。其次，絕大多數華人都反對這種做法，實行此一政策恐怕會先在內部造成大亂，「任何人若參與製造或推動這種運動，在歷史上恐難逃『漢奸』的臭名」。第三，變成「一中一臺」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因繼承的問題而失效。「我國一向是統一的國家，即使在軍閥割據的民國初期也是一樣…不管大陸是什麼人當政，中國絕不能再容忍任何國家將已經復歸祖國的臺灣分裂出去…**臺灣不獨立或可自保，一旦獨立，必爆發內戰及外戰，其命運可想而知**」。<sup>27</sup>

---

pp. 81-84。在民族的觀念尚未後經主觀論與建構論的說法「解構」以前，一般人的常識是只有「一個中國」，而很難跳出此一認識障礙。對那些在1970年代民族主義風潮下渡過寶貴的青年歲月，尤其是曾積極參與保釣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因為這段經歷是他們生命中真實而深刻的一部分，以致即便到了1990年代，在歷經統運的幻滅、舊有的民族觀念已廣被解構、民族「虛構」與可能有的「壓迫」的一面為人更清楚地認識到後，他們多半仍對民族主義「崇高」的一面有所緬懷，而較難以保持距離的觀察者角度來審視它。像劉大任便說：「民族主義這一類的情緒，也不是像目前台灣大家想像的那麼虛幻的事情，有些東西，跟你的生命本源有關。像你與你母親，對自己誠實的話，不必把它看成很虛枉的，它是屬於你的」。見楊澤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市：時報文化，1994），頁147。另外像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市：聯經，2001），也透露出類似的情懷。

<sup>25</sup> 其實，國民政府或說蔣介石並非毫無彈性、不知變通。以1961年外蒙古加入聯合國為例，為避免形成兩個中國，確保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最後便出現決策大轉彎，默許外蒙古為獨立的國家。見王正華，〈蔣介石與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國史館館刊》，期19（2009），頁133-194。可是國民政府顯然未能由此學到教訓，以致十年後不但將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頭銜拱手讓給中共，連國家的資格都一併喪失。

<sup>26</sup> 丘宏達，〈從國際法觀點論釣魚台列嶼問題〉，《大學》，期37（1971），頁20-23。當時的台大代聯會主席王復蘇在後來的訪談中也只會說，「就歷史、地理乃至於國際法的觀點來看，釣魚台之隸屬於我國領土，乃是不爭的事實。但外交是沒有真理可言的」，無法理解沒有真理背後的遊戲規則。見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上》（台北：龍田，1979），頁124。

<sup>27</sup> 丘宏達，〈我國退出聯合國後所面臨的問題〉，頁9-16。

丘在公開座談中也主張我們「不要夜郎自大，自比西德南韓」。<sup>28</sup>然而，台灣與大陸實力懸殊固是事實，但就在我退出聯合國前的 1971 年 9 月 22 日，我國代表還得到 73 國支持當選聯大副主席，<sup>29</sup>可見多數國家在接納中共的同時，未必想將國府趕出聯合國，退出聯合國恐怕更多是國府的決策，而不完全是局勢所迫。<sup>30</sup>從丘不斷使用「漢奸」的道德性措辭來看，他之所以反對採取分裂國家的模式（雙方在統一前承認彼此皆為國家），恐怕還是受傳統觀念影響，認為中國不容分裂。也因為國府長久以來反對（即便是暫時性的）「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才使自己一直處於從現代法理原則來看國家未統一前「非國家」的狀態，更隨著國際局勢演變落入無法歸類的異例。從傳統象徵政治與道德政治的角度來看，我們才能理解，為何國府在 1958 年與美簽訂聯合公報，已明知反攻不可能後，口頭上卻從不敢鬆口或改口，仍信誓旦旦要反攻或光復大陸。因為它擔心放棄「反攻」的象徵不但會危及其統治的正當性，所產生的心理效應更可能導致政權不穩。<sup>31</sup>所以，儘管國府開始主張「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sup>32</sup>說反攻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sup>33</sup>但在 1970 年代初「革新保台」形成挑戰並成為主流論述前，國民黨政權在公開的、陽的一面，仍繼續堅持反攻論述，灌輸、勸說人民光復的夢想，以致在國府教育體系下成長的新世代多仍相信並執著反攻大陸的理想，就如我們在 1972 年底台大的民族主義論戰，以及 1975 年因蔣介石過世而引

<sup>28</sup>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台北：自立晚報，1993），頁153。

<sup>29</sup> 薛化元主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I（1966~1978）》，頁150。

<sup>30</sup> 1972年3月15日，台大政治系教授黃祝貴在台大代聯會主辦的演講中也提到，「去年7月以後，中共同美國，有一項諒解，就是去年美國可以連署支持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希望我們留在聯合國，今年則未必…一方面是我國外交政策的錯誤，當初我們在外交上採取漢賊不兩立的政策，這是違背常識的決定。另一方面，從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的對外政策，也有錯誤，中共若稍為採取圓滑態度，和不發動韓戰，則中共入聯合國，是早已存在的事實」。見黃祝貴教授講，林寬達、劉慧美記錄，〈「尼週公報」後的我國局勢〉，《大學》，期51，頁14-17。另外，麥立（王曉波），〈評留學生的三種政治方向—給海外友人的一封信〉，《大學》，期49（1972），頁55，也說：「如果國民黨只欲求一政權之生存，而成立『臺灣國』，求得國際間的承認，當是輕而易舉之事」。同樣地，1971年2月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整理出「具可行性」的五個方案，便包括「兩個中國」、「分別代表個體，但安理會由中共取代」、「分裂國家整批入會」、「由安理會通過我代表台灣，中共代表中國」等。見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頁145。就是當時的外長沈昌煥也判斷，「我僅代表台灣，中共僅代表大陸。此為目前許多國家所最希望者」。但這終因當時最高領袖蔣介石不願放棄對大陸主權而未曾積極嘗試過。見周谷編，《胡適、葉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台北市：聯經，2001），頁314。

<sup>31</sup> 在1950年代台海間軍事上仍緊張時，這更是實際且嚴重的威脅，見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6（2001），頁231-297；石之瑜，〈自由主義的「復興基地」：保守政治家沈昌煥的最後見證〉，《近代中國》，期155（2003），頁120-23。

<sup>32</sup> 甚至，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在這之前國府多採用反攻、光復等詞，而少用「統一」。

<sup>33</sup> 國史館編，《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台北市：國史館，2000），頁83-85。

發的獻機報國運動中看到的一樣。<sup>34</sup>

這樣的正當化論述與威權教育體制，雖然讓台灣成為 1960 年代全球惟一沒學潮的國家，卻也是惟一出了國以後才鬧學潮的國家，<sup>35</sup>並使得國民黨日後自食惡果，付出慘痛的代價。由於不想也不敢誠懇面對丟掉大陸的歷史與經驗，國民黨來台後鼓吹的只是一種空洞的民族主義，<sup>36</sup>不但切斷與大陸的連繫，切斷五四以來中國最有反省與創新能力的新傳統，乃至發展出「五四亡國論」，同時也斬斷了台灣日據以來的本土傳統，因兩者皆威脅到其生存。<sup>37</sup>早在鈞運興起前，張系國便已就留學生問題反省到，「現代『知識份子』對中國出奇的缺乏認識。在台灣長大的一群，幾乎完全精神上『美』化了。他們出國前，根本沒有機會了解中國，更不瞭解台灣。他們除了『親屬』的鍊子外，沒有什麼東西能將他們與台灣連在一起，他們對台灣更缺乏感悟，沒有休戚與共的感情，不覺得台灣是他們的故鄉，使他們精神上與台灣或大陸兩者都脫了節…必須先要他們認識中國，尤其是中國的農村…要他們了解，台灣就是他們的家鄉…國內青年朋友們習慣喊的，『精神上無故鄉』的口號，是我們必須破除的第一謬論」。<sup>38</sup>

<sup>34</sup> 黃道琳在民族主義論戰中便說「我們不但要反共，更要進一步反攻」；鄭鴻生、謝史朗、張錦焜在與穆谷（孫慶餘）的筆仗中更說「我們可以一字一句的將蔣總統的廬山宣言，和著淚水倒背給你聽！」，參見王曉波，《尚未完成的歷史：保釣二十五年》（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6），頁438。又獻機運動背後可能有的軍事意涵卻給國民黨造成難題，以致在過程中被黨國刻意導向「建館」這個與之競爭的替代選項，而且最後這筆捐款也的確被挪用來蓋中正紀念堂，而未用於復國大業上。見丘為君等，《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上》，頁234-237。

<sup>35</sup> 張景涵，〈大專訓導工作建設性的新方向〉，《大學》，期55（1972），頁31-36。在討論大專青年教育問題的座談會上，馬英九則說：「身屬心不屬。青年對國家社會普遍缺乏認同感。反映二十年來教育的失敗。學校當局似乎認為，只要學生在校時不出亂子就好了，至於出國以後是不是左傾，會不會搞臺獨，就不是他們的責任了。」見〈大專青年教育問題座談會（上）〉，《大學》，期58（1972），頁19-30。

<sup>36</sup> 對此，陳秉華，〈讀「一封無法投遞的信」有感〉，《大學》，期54（1972），頁38，曾如此申論：「今日學生冷漠是無可否認的，國家民族意識普遍低落，學生本身固難脫其責，但愛國家，愛民族不是口號，不經過深切的了解和廣泛的接觸是不足以產生這一份愛的，然而我們所獲得的接觸與瞭解在那裡？歷史課本上記述的是五千年悠久文化，但對於大陸淪陷，與目前環境休戚相關的史料卻草草一筆帶過，今日我們的課本難道還該沉緬於三大發明之中嗎？再說對於中共的所做所為，除了宣傳式的反毛反共，其他幾乎一無所知，沒有人告訴大學生大陸失陷的原因何在，我們為什麼必須反共，中共的錯誤何在？在只一味灌輸卻不比較的單線教育下，能產生什麼真確的認識？認識不真確，立場就容易動搖，信仰就易受蠱惑，堅定的信仰不能建立，愛國家、愛民族的力量如何能發揮？」另外也可參見夏沛然，〈一個保釣左派的反思錄〉，「一九七〇年代保釣運動文獻之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2009年5月2-3日，三十多年後類似的反省。

<sup>37</sup> 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市：新地，1995），頁5-15、177-83。

<sup>38</sup> 張系國，〈談留學生〉，《大學》，期20（1969），頁11。希望外省人拋棄漂泊心態、轉而認同台灣為故鄉的想法，同樣反映在張系國日後追憶保釣的《昨日之怒》（台北：洪範：2002[1979]，頁279、

## (二) 民族主義與統一的關聯

重新認識中國無疑是許多台灣留學生，尤其是外省籍者，出國後自覺應補修的功課。<sup>39</sup>同樣在保釣前，劉大任已主張「丟掉五四的爛包袱，睜開眼睛，直接觀察今日整個中國與整個世界，是今天知識份子的第一步」。<sup>40</sup>當這些在台灣八股教育的溫室中成長的學生踏出這一步後，就是那些以往最可靠、最忠貞的類型，也可能沒過多久說變就變。因為在面對種種令人眼花撩亂的宣傳時，他們的內心不免產生「受騙」的挫折感，激發他們做反動的轉變，從極右的角色一躍而入極左的世界。張俊宏在訪美後對台灣留學生何以轉而認同中共有如下的分析：留學生出國前多對台灣的生活方式和氣氛甚為不滿，本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到美國，但到美國後，在面對種族、生活方式及經濟的龐大壓力下，他們很容易對美國產生情緒上的反抗。恰好在這個時候，中共以反美的姿態躍升為強國，造成美國的「中國熱」。在想藉「強大」的祖國形象提升自己在美人心中的地位，醫治自己的心靈創傷等複雜心理下，台灣留學生常匆促地選擇認同中共。而且，為了避免自己心靈與人格的統一再次為台灣與大陸現實政治上的分隔所撕裂，他們最後走向了統一的運動。<sup>41</sup>

事實上，海外在 1960 年代多選擇性地只認知文革美好的一面。在世界性青年反叛運動氣氛的感染下，台灣留學生很容易為對文革、社會主義理想中國、擁有核武的強大祖國等想像所吸引，認為「真理在海的那一邊」，並不令人訝異。<sup>42</sup>隨著釣運轉向統運，中共相應地在進入聯合國後發起「和平統一」運動，展開

---

288) 中。藉書中人物、身為外省人的施平之口，他認為海外的保釣對參與者來說雖是終點，但希望國內的保釣能是一個起點，並且期待外省人在明瞭上一代的恩怨情仇之餘，能認同台灣為「老家」，就算不被接受，至少也要能以守望者的姿態在外面愛護它：「我的出身是我所無法改變的事實，這不是我的錯，但我卻必須對我的出身負責，也許祇有做一個守望者，我才能彌補我們所做的一切，補彌我們一切的罪過。」

<sup>39</sup> 在島內的人則有重新認識中國的渴望，見鄭鴻生，《青春之歌》，頁140-145。

<sup>40</sup> 劉大任，〈留學生的思想框架〉，《大學》，期25（1970），頁39-41。引文雖和「五四亡國論」及呂正惠論及的五四傳統共同使用了「五四」這個元素（element），但係嵌在不同論述中的不同環節（moment），有不同的意義和指涉。劉指的較像是台灣所能觸及的有限的自由主義傳統，甚至是遭官方扭曲後的五四樣板。又相對於劉氏丟掉五四包袱的說法，在國內的葉洪生則感嘆無法理解為何不擴大慶祝五四，「以團結海內外青年？難道是因為中共訂『五四』為『青年節』後，就不戰而屈我們『文藝節』的文化尖兵了嗎？」。見葉洪生，〈二十年一覺飄花夢 - 從一個年輕人的時代感受談起〉，《大學》，期47（1971），頁39。

<sup>41</sup> 張俊宏，〈訪美所見所思〉，《大學》，期69（1973），頁15-22。

<sup>42</sup> 水秉和，〈保釣的歷史回顧〉，頁62-72；楊澤編，《七〇年代》，頁73-83。又這背後涉及世代經驗差異的問題，如王漢興、陳華強，〈論「青年與政治」〉，《大學》，期49（1972），頁36-44，指出的，上一代有與中共鬥爭的親身經驗，在台灣成長的安樂一代卻沒有過鬥爭的真實感；上一代看

「認同」、「回歸」、「統一」的論述攻勢，國民黨本也用以鞏固、正當化其政權的統一論述與民族主義反變成它當下最大的威脅。因為，「在毛共沒有原子彈以前，海外學人大部份都傾向臺灣，其次是中立或騎牆派，只有少數親共。但自從毛共有了原子彈後，起了巨大的改變，大部份人都變成了中立，只有少數人還傾向臺灣…很簡單，共產主義把大陸搞強了，民族主義的招牌在表面成功了。」<sup>43</sup>而且，就像黃祝貴說的，台灣的情形不可與以色列相比，「以色列遭遇的是外患問題，有民族主義觀念，使其一致對外！中共則反可利用民族主義來作為統一中國的工具，形勢不同！」<sup>44</sup>

在「許多由大陸來臺赴美之留學生態度，偏向中共，而許多臺籍之留學生又在搞『臺獨運動』」的情況下，<sup>45</sup>國民黨政權不但在論述上陷入兩面作戰的困境，更處於腹背受敵的重重危機中，因為這些紛擾不只在海外有效應，而是也會在國內造成連動的影響。<sup>46</sup>像保釣的風潮不但傳進國內，學生們對國府在捍衛領

---

過中共對「蘇聯老大哥一面倒」的醜劇，這一代看到的卻是「麥克瑪洪線之爭」和「珍寶島事件」，故上一代有以民族主義反共的，這一代反多因民族主義同情中共；上一代曾親見中共奪取政權時的殘暴，新世代卻從漏網新聞中看到長江大橋的完工和核子試爆的成功，對此又乏合理的解釋；上一代見識過中共利用自由民主奪權的手段，成長於民主制度下的這一代則是按西方自由民主的標準來批評政府。

<sup>43</sup> 〈大專青年教育問題座談會（上）〉，《大學》，期58（1972），頁29。

<sup>44</sup> 黃祝貴教授講，林寬達、劉慧美記錄，〈「尼週公報」後的我國局勢〉，頁17。釣運參與者自己的說法則是，「當今中國人民中老一輩和年青的一輩意識形態上最大的隔閡便建築在『分裂』和『團結』這兩個概念上」。見木君，〈兩個運動，一個方向（轉載自紐約釣魚臺簡報）〉，《大學》，期44（1971），頁58。在大陸強台灣弱的情況下，人們想團結的對象自然是中共而不是國府。同時，由於釣運是團結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而不是根據對國際現勢及國際政治遊戲規則的認識，所以早在轉向統運前，便決定一塊打擊「台獨」及「兩個中國論」。見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中》（台北：龍田，1979），頁547。對此，李慶華，〈中共對我留美學生統戰的分析〉，《大學》，期57（1972），頁28-30，如此分析：「一般海外青年，因急於見到一個統一的中國，就往往忽略了中國人民生活在中國共產黨制度下的痛苦。看到中華民國政府二十多年並未收復大陸，統一全國，僅形成一個僵持的局面，在心理上就容易誤認中華民國政府無異於在製造兩個中國。此時，見到中共所提『和平統一』的口號，就產生了一種空中樓閣的滿足感，而加以飲鳩止渴般地支持。」

<sup>45</sup> 張宏遠，〈說幾句內心的話〉，《大學》，期47（1971），頁18。海浮子，〈中國的現狀與我們應走的道路〉，《大學》，期54（1972），頁20-21，同樣也說：「臺籍人氏不滿便會臺獨，非臺籍人氏不滿便傾共，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人在大海中總要抓著一片木板。這就是海外人士所謂的『認同問題』」。

<sup>46</sup> 這可見證於《大學》編委呂俊甫在「小市民」事件後，不得不主動表白《大學》的立場：「我相信大家的基本立場都是反共、反臺獨，大家都期望國家在不斷革新中日漸強大和現代化。我所以要說這番話，是因為有人對本刊不甚瞭解，而孤影先生『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也似乎是針對本刊一、二篇文章而發的」。見呂俊甫，〈「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讀後〉，《大學》，期53（1972），頁79。沈君山在1971年安娜堡的「國是大會」上則說，「就目前的國際形勢和中共本身實力而言，解放台灣

土主權上所顯示出的軟弱也同海外學子一樣感到氣憤。<sup>47</sup>隨著海外民族主義紛爭與認同問題的湧現，台大學生在1972年12月4日舉辦了「民族主義座談會」，隨即引發論戰。擁護「不用民族主義自衛，就要亡國」立場的學生主張，「對內而言，民族主義就是熱切的同胞愛、一體的歸屬感；對外而言，民族主義是以對抗帝國強權的干涉、剝削。而在目前的局勢之下，不管對內對外，民族主義都有提倡之必要」。<sup>48</sup>由於強調一體的歸屬感將導向忽略差異、要求「統一」，<sup>49</sup>而無力外抗強權的事實只會升高對政府的不滿，在海外釣運變成統運般鑑不遠的情況下，統治當局對國內民族主義論述的興起，毋寧是抱著極為戒慎恐懼的態度，若其稍有左翼色彩或統一傾向，就更是如此。

因此，儘管民族主義與統一論述表面上是國府一向的主張，但在當時的環境裡，這樣的主張在當局眼中卻成了實際上對其政權的最大威脅，是它私底下最擔心的替代論述，以致提倡民族主義的學生與年青知識份子成了最先被鎖定打壓的一群。<sup>50</sup>因為，國民黨來台後是採取「兩國」模式的霸權計畫，<sup>51</sup>優先拉攏、照顧外省人。當海外經驗顯示，離鄉背井的外省人極易受到中共回歸與認同的口號吸引，以致繼續高談民族主義與統一論述的結果將是鬆動自己政權最堅固的牆腳時，國民黨將毫不遲疑地進行鎮壓，以免政權立刻倒台。

### （三）兩國霸權模式下的省籍分歧

---

即使可能，至少還要一大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國民政府的政策政制若不來一個澈底的改革，內外交激之下，統一不成，很可能先引起一場省籍對立的流血暴亂」。見沈君山，《尋津集：從革新保臺到一國兩治》（臺北市：遠流，1989），頁18。

<sup>47</sup> 海外的管道同時還提供了國內較具批判性的學生團體另類的精神食糧，尤其是台灣不易得見的左翼書籍。見鄭鴻生，《青春之歌》，頁126-28。另外像張俊宏1972年秋訪美，才首次接觸到大批台獨刊物，對他造成極大衝擊，進而促成他1973年參選時公開分發主張「政治主權式的台獨」與「民權運動式的台獨」，反對「武裝革命式的台獨」的傳單。見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頁84；張俊宏，《我的沈思與奮鬥：兩千個煎熬的日子》（台北：作者自行發行，三榮印刷，1977），頁90-101、125-26。

<sup>48</sup> 王曉波，《尚未完成的歷史》，頁441。

<sup>49</sup> 例如，當反對的一方主張，「的確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提倡民族主義是唯一的自救之道。但今日我們面對的不是黃髮碧眼盎格魯·撒克遜人，而是與我們同文同種，在共產獨裁或政治統治下的『中國人』。如單打著民族主義的大旗，不但不足以摧毀共產政權，更不足以自救自保」，「那些你想造成情感交流的『同胞』，正隨時可能在共匪的一聲令下血洗台灣…對於敵對雙方，勉強把『同胞』和『國家』分開來是沒有意義的」，提倡民族主義的一方則強調，「同胞就是同胞，好的、壞的、燒成灰的，也都是同胞…縱使中國不幸再分裂成千百塊，我們也要談民族主義，這就是所謂的堅定的歸屬感」。引自王曉波，《尚未完成的歷史》，頁377、425、436。

<sup>50</sup> 詳見後面第四節的分析。

<sup>51</sup> 兩國霸權模式係引自Bob Jessop,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211-212, 的概念。

同時，國民黨還必須擔心在「兩國」模式霸權計畫下遭到差別待遇的本省人心有不滿，政治意識升高，乃至起而反抗。<sup>52</sup>1970年3月1日，以「閩南語」演出的黃俊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開播，創造97%收視率的大流行，乃至造成「兒童逃學，農人廢耕」的現象。<sup>53</sup>這看在認為台人深染日本帝國主義遺毒，來台後即不遺餘力地抑制台灣意識成長的國民黨眼中，毋寧是個警訊。同年11月27日，「雲州大儒俠」終遭到停播的命運。<sup>54</sup>1971年1月，在海外保釣剛起，《大學》才改組的時刻，張景涵（張俊宏）便已勇於「提出大家諱言已久的問題：第二代的地域觀念；也就是本省外省青年地域隔閡的問題」，認為「只憑著『臺灣同胞都從大陸來』的簡單說法是無法治療這種沉疾的」，而必須「在現實社會中找答案」，主張「以機會均等消除地域歧見」。<sup>55</sup>張氏雖然還是沿用威權統治者帶有價值評判色彩的「地域歧見、偏見」的論述架構，但總是突破了既有輿論的議題過濾、篩選作用，開始為省籍分歧的問題爭取到獲得公開論題化和關注的機會。雖然這立刻引來關中等表示不同意見的公開信，但隨著時局的推移，對省籍問題的論題化不但日益公開，連台獨的議題也突破禁忌，浮上檯面 – 儘管可想而知多只能出現在負面論述的架構下。最後，新的論述還慢慢跳脫了統治者地域意識、偏見的區分架構，而提出鄉土的新指稱與新架構來取代。

1971年7月7日，在美國重申「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未定」後不久，而海外統獨宣傳戰煙硝瀰漫之際，「為消除國民地域隔膜」，省議會通過提案，「建議政府修改戶籍法，在『本籍』、『寄籍』的記載外，增列『祖籍』一欄，以建立國民『數典不忘祖』與『來台無分先後』之健康心理」。<sup>56</sup>《聯合報》的〈黑白集〉並盛讚「此一提案，真稱得上『震大漢之天聲』」，其所思所見之遠大，足以在我國民主政治史大書特書…目前播遷台灣定居的同胞，除少數山胞而外，均來自大陸，其族氏籍貫，斑斑可考；日本統治時期，為遂行其奴化政策，多方設法使之忘記自己為中國人；迨光復之後，家家戶戶，重祀祖先，雖戶籍中未註明祖籍；但人人沒有忘記其所自來。省議員為恐歷久昧其本原，建議在戶籍上加註祖

---

<sup>52</sup> 沈君山在1971年安娜堡的「國是大會」上便說，「國民政府的燃眉之急不在外患而在內憂…台灣的群眾，從知識份子到軍隊到勞苦大眾，至少現在對共產主義都不會聽得進耳去。但是他們對乞丐趕廟公的話卻聽得懂，現在大家有飯吃相安無事，一旦經濟蕭條失業叢起，一加煽動，怨尤第一個先放在政府身上，類似二二八的事件，不是不可能發生的」。見沈君山，《尋津集》，頁25。

<sup>53</sup> 何凡，〈玻璃墊上：再談減少地方戲〉，《聯合報》，1970年6月3日，第九版。楊澤編，《七〇年代》，頁17。

<sup>54</sup> 1972年12月7日，教育部文化局更限制三家無線電視台每天的方言節目不得超過一小時。18時30分後，閩南語節目限由一台播出，三台各輪流十天。

<sup>55</sup> 張景涵，〈消除現代化的三個障礙〉，《大學》，期37（197），頁8-10。

<sup>56</sup> 霧峰七日電，〈省議員建議政府修改戶籍法增列祖籍欄〉，《聯合報》，1971年7月8日，第二版；薛化元主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I（1966~1978）》，頁146。

籍一欄，我們相信每一個炎黃子孫，無不樂予支持。」<sup>57</sup>

9月，梁文在《大學》發表反對的看法。他雖表示贊同此一提案「從民族大義出發」的本意，認為這「實在是要反駁『臺獨份子』的『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的謬論」，但認為身分證加註祖籍的手法值得商榷。因為「要想消除臺灣同胞與外省同胞之間的隔閡，唯有一點就是取消身分證上的『本籍』，既同為炎黃子孫的中國國民又何必要有省籍之分？『本籍』的列入不過增加同胞之間的地方意識，而傷害了我們整體的民族意識…為什麼不把取消『祖籍』作為強固國民民族主義的第一步，反而要去添加『祖籍』以擴張傷害民族主義的地方主義和家族主義呢？」<sup>58</sup>儘管這種融化論的說法言之成理，並且是援用國民黨一向擁護，因此難以公開反對的中華民族五族共和的融合論，<sup>59</sup>但在國民黨看來，如此做卻不利於維持身為少數的外省人在政治上的優勢，而是有利於人口上居多數，但當時政治上卻屬劣勢的本省人。因此國府後來雖未採用加添祖籍之議，但也一直要到1992年戶籍法修正時，才取消「本籍」規定，到1996年換發身分證，才正式以出生地取代之。<sup>60</sup>同時，梁文在批評帝國主義分化中國，導致有「臺獨」、「滿獨」、「新獨」、「藏獨」和「蒙獨」之餘，主張「我們中國人只有一個『獨』，那就是獨立的大中國」，隱然有以台灣為本土，現實上主權獨立的味道。他並進而對「臺獨」的產生進行歸因，認為「除了帝國主義陰謀外，還可能涉及到我們內政的未能完善之故…由於『非常時期』之故，我們在臺實施的內政，多少有一些問題，消除這種內政上的問題才是解決『臺獨』的根本之道」。<sup>61</sup>這顯示，在當年的時空環境下，儘管梁文有主張現實主權獨立的傾向，卻也不敢公然主張以實際統治的疆域範圍獨立自成一個國家（兩個中國或台獨），而只能指桑罵槐地要求改革內政，走革新保台之路。

國民黨對省籍意識發酵的擔憂，反映在退出聯合國後，台大校內反制要求改革，尤其是國會全面改選的意見上。時為畢聯會主席的趙少康，在1971年11月1日《畢聯會訊》創刊號上，主動提及省籍的問題：「我們今天特別要留心任何煽動，不論是學生與學校間，青年與政府間，本省同胞與外省同胞間的分化，都是其（毛匪）陰謀詭詐的重點…現在，不是一個批評指責的時候，我們該立刻

<sup>57</sup> 黑白集，〈祖籍〉，《聯合報》，1971年7月9日，第三版。

<sup>58</sup> 梁文，〈祖籍問題〉，期45（1971），頁27。

<sup>59</sup> 另1973年6月時，曾有資深立委提案建議取消本籍規定，改採「屬地主義」，效法六朝時「土斷」做法，以消除省籍及地域觀念，促進社會團結和向心。但在僅有一人發言反對，沒有什麼討論的情況下以極懸殊比數遭到失敗。見范莫頓，〈戶籍法應不應採「屬地主義」？〉，《大學》，期66（1973），頁15-17。

<sup>60</sup> 進一步可參見王甫昌，〈由「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台灣社會學》，期9，頁59-117。

<sup>61</sup> 刊於同一頁的張明能，〈談吏治〉，《大學》，期45（1971），頁27，與梁文的說法相呼應，指警察稅吏索取紅包，「使得老百姓不勝其煩，甚至有人開始回想以前日本統治時代」，進而要求政府開放輿論以顯示革新決心。

檢討策勵，同舟共濟是救亡圖存的唯一途徑，如果有人在此提出獨立或自治的主張，毫無疑問的，其用意在於動搖國本而逞其權術的詭詐，這是我們必須『嚴厲制裁』的。」<sup>62</sup>傾向黨國立場者會主動論題化省籍的問題，顯示這就算不是普遍存在的事實，至少也反映出他們普遍的擔憂。事實上，在 12 月陳少廷與周道濟國會改選的辯論中，陳氏便敢於突破禁忌，婉轉地點到二二八「不幸」事件，但馬上以政府無須為後來附匪的陳儀的暴政揆黑鍋帶過，主張藉全面改選來消除省籍歧見。<sup>63</sup>

雖然《大學》成員毋寧是有意識地節制自己不碰觸敏感的省籍議題，<sup>64</sup>但從日後討論限播「台語」節目的文章「意外地」引發熱烈辯論來看，省籍對立情緒潛伏已久，<sup>65</sup>統治當局對此不會毫無知覺，何況公開的論題化會再次強化此一建構。論辯最初源起於外國研究者家博 1973 年 1 月 19 日載於《中央日報》副刊〈論電視語言與農民心聲〉的投書，建議政府開辦使用閩南語的新聞與氣象報告，保留閩南語節目，但改進其內容，使得在任何廣播時間內，至少有一個閩南語和國語的節目。這引發署名「草地人」者投稿 2 月號的《大學》，批評輿論界圍剿閩南語節目的熱潮，「將閩南語節目的去除當做淨化問題在討論」。他認為在三家電視臺均已遵守政府百分之十七的閩南語節目規定的情況下，還有人認為「閩南語節目已經造成『氾濫』或『污染』了電視」，要求再嚴加限制，只會製造問題，惹來閩南語節目觀眾的反對，乃至有「因不慣國語片而砸電視的新聞」，或是成為候選人藉以「引發龐大聽眾熱烈共鳴」的政見。他接著筆鋒一轉，指台省同胞之所以未表達心聲，除了家博提及的教育問題外，更重要的還是他們的「隱忍習慣」，或因有所「顧慮」，「必須提防被人扣上帽子」所致。他強調只有當「學校不教國語，或禁止用國語」，才會出現「因講閩南話而忘了國語」的情形，

<sup>62</sup>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頁 162。

<sup>63</sup> 就是較考量到黨國立場與歷史包袱的周道濟亦說，「在臺澎金馬，人與人之間可能有點隔閡，但如果都能像我和少廷兄這樣，就沒有隔閡了，國家就有希望了。至於政治上的公道問題，需要以快步伐盡早糾正」。見陳少廷、周道濟，〈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辯論〉，《大學》，期 49（1972），頁 87。

<sup>64</sup> 這反映在編者對閒人一文所加的按語，以及在以編輯部名義回應的文中提到，讀者不但反應熱烈，而且贊成和反對的觀點都是處在兩個熱烈的極端，令「我們開始感覺到這件事的背後還潛藏有地域意識的牢結」，故遲未刊登相關來信，因為「我們還沒有把握到底公開繼續來討論它好，或者避免再去觸及它好？」。後來基於「感覺到逃避它顯然並無法使地域意識化為無形，彼此缺乏溝通的牽絡難免使誤會越積越深，萬一有導火線亦將難免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才選擇公開討論，希望「至少讓大家真正了解對方深藏的情緒…促成真正的和諧」。見閒人，〈論「國語」與「方言」－評「與『冷靜』湊『熱鬧』」一文〉，《大學》，期 67（1973），頁 17；本社編輯部，〈為「冷靜湊熱鬧」一文給「閒人」先生的信〉，《大學》，期 67（1973），頁 20。

<sup>65</sup> 這可見證於外來者 1960 年代對此的觀察，如 Fox Butterfield, "Chinese Nationalists Still Face Hostility from the Taiwanese" *New York Times* 12 (October 1969), p.7; Maurice Meisner, "The Development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in Mark Mancall eds., *Formosa Today* (New York: Praeger: 1964), pp. 147-162.

「閩南語節目不會妨礙國語的推行，而且有助於民族的團結。執政黨告訴她的黨工人員要學閩南語，其目的相信也在於此」。<sup>66</sup>

這隨即引出二毛的不同意見，<sup>67</sup>因為他拜讀後，「心裡覺得似乎被什麼東西壓抑著了，久久無法舒坦」。他覺得在三台競相於黃金時段播閩南語節目，而且「就是在其他的時間裡，閩南語的節目也較國語的節目『吃得開』」，但其絕大部分的內容「不是在極力的宣染暴力，就是在作無病的呻吟」的情況下，「就是澈底的『圍剿』亦不為過」，並批評閩南語節目有助民族團結的說法「謬不可言」。他進而提及今天我們對國語的忽視已到了可怕的地步，以閩南語交談被視為理所當然，有人提出此問題時反引起大家的詫異，報紙分類廣告人事欄上更「全是『限台籍』、『限精通閩南語者』之類的字眼，難道我們的工商界就真是如此排擠自己的同胞嗎？」他因此批評許多人「潛意識地以為國語只是一種外省人的話，是一種政府高級人員的『官』話，與『民』無關！而來到本省的人，就必須入境隨俗」是極保守的想法，不能體諒政府「以自願同化的原則進行民族同化，期熔我全國同胞於一爐」的用心良苦，「是任何一個明瞭現今國家處境的人所無法接受的」，他「絕不歧視或排斥閩南語」，但「在這個時候，說國語比說方言要更具有意義」。<sup>68</sup>

至此，論辯的溫度開始升高，應一山便在下一期對前文展開針鋒相對的批駁。他說不論是有心還是無意，將「『淨化』（電視節目）與限制臺語節目的步驟混在一起…臺語是不乾淨的錯覺不免油然而生」，然而「說臺語的人，也是我『中華民族』，而不是『各民族』…臺語是中國古代吳越地之言…聽起來雖似十分俗而白，但實際上卻十分文而古…提倡臺語事實上應該是與『恢復我中華民族的固有文化』不相違背的」。他進而表示，「有許多國家是同時使用幾種語言的…臺語不過是此地的一種『方言』，和國語還使用同一種文字…臺灣現在是復國的基地，如果每個人都能國臺語並用，必能增加同胞間感情的交流，達到水乳交融的地步，對於反攻復國的大業才是真正有幫助的」。<sup>69</sup>

雖然《大學》編輯群在發覺事態朝出乎意料的激烈對立，對「民族團結」進行論題化的方向發展後，曾刻意予以降溫，<sup>70</sup>但在遭自稱學生，署名「閒人」者指責《大學》為何刊登「全文有強烈的『外省』、『本省』；『官』、『民』的對立性！而見解則空洞無憑得很」的應氏一文，「不願意眼看貴社『走火入魔』，

<sup>66</sup> 草地人，〈說句良心話〉，《大學》，期62（1973），頁47-48。

<sup>67</sup> 但這中間因遇上《大學》內部討論是否休刊，此期刊出時延了一個半月。

<sup>68</sup> 二毛，〈冷靜地想一想〉，《大學》，期63（1973），頁61-62。

<sup>69</sup> 應一山，〈與「冷靜」湊「熱鬧」〉，《大學》，期64（1973），頁49-50。

<sup>70</sup> 不過，其間曾刊有陳木益，〈大中華，何相煎？〉，《大學》，期65（1973），頁3-5，的讀者投書，批評「一向愛國呼聲最響，反日之聲最烈，且甚為青年重視的中華雜誌，竟然在國難當頭之際」，刊登閱前鋒「深富挑撥性的」文章，「說本省青年自得自滿於臺灣之小天地，而不知何謂『反攻』與『大陸』，且有點畏懼共產黨，從不關心如何戰勝共產黨，並有『反攻大陸祇是外省人的事』的想法」。

更不願貴社成爲『臺獨』在臺根據地，亦不願大學雜誌終於成爲清一色臺灣同胞的刊物」的情況下，<sup>71</sup>《大學》終不得不予以回應，於 67 期同時刊出「閒人」的投書和「本社編輯部」掛名的回應。閒人在文中批評，「若人人都有『臺獨』份子所謂『吾鄉吾土』式的感情的話，堂堂一個中國如何能夠建立？至少應該有三十六個國家才對囉！臺灣還是最小的一『國』呢！…全國語言統一，豈不比『國臺語並用』更爲一勞永逸？」他認爲「除非暗認臺語亦相當於一種『國語』」，否則臺語無從和國語相提並論，而如果「一個中國人連爲了說國語都不願犧牲小我，還有什麼愛國情操可言？」他接著說政府是以漸進的方式推行國語，不應有牢騷，批評以「生活背景」不同爲理由，只是藉「臺灣現在是復國基地」的現況來「討價還價」，進而申論臺灣和大陸本土終究有一水之隔，「所以臺省同胞自然由於『生活背景』的關係，比較缺乏整體的概念，比較沒有國家觀念，所謂『臺獨』恐怕亦是因此『應運而生』的吧？…臺灣人常自絕於『中國』之外，這是事實呀！」最後，他再度質疑《大學》爲何刊應氏「易引起『分化離間』作用的」文章，「同樣是中國人，黃種血統，憑什麼臺省同胞要比其他三十五省的人要老實勤勉些？應先生大概只發揮臺省同胞善良的一面，而忽視了那些…地痞流氓！那些隨地亂吐檳榔的人！更妄顧於那些日常講話時，喜歡夾雜日本話的『老實勤勉』的本省同胞！想想看，寧可不說國語，卻喜歡夾雜不成文法的日本話的同胞！」<sup>72</sup>

在回應時，《大學》編輯群首先說明因考慮到「政府和內地同胞平時較有表達他對此問題的看法和情緒的機會，本省同胞對此一敏感的問題卻很少公開表達過，他較習慣於隱忍，但並非沒有強烈的情緒」，基於「適當使它疏洩，促進交流…會更爲安全和適當」，才決定刊登辯論的文章。他們進而表明「本刊數年來一項最主要的努力方針，便在於如何化除地域歧見…今後我們還要全心全力地使本刊成爲地域差距的橋樑，而非所謂『台獨的根據地』」。但接下來，他們便展開意在言外的強力反擊，把矛頭指向統一取向的民族主義：「假如教育我們的國民練習面對現實，承認現實，腳踏實地的從事各項促成團結的建設，也會有『副作用』的話，這種副作用恐怕遠比教育我們的國民盲目『認同』而造成『回歸』風潮的副作用，對於全體的生存以及未來中國的前途而言，要更具有建設性一些。相信所謂『臺灣人』也未必會如『閒人』所說不會『認同』中國，問題是你提供了什麼認同的理想和標的」。他們明指閒人曲解《大學》64 期胡雲天因休刊事件來信打氣的讀者投書，<sup>73</sup>「胡先生…的用意與其說是『煽動』臺獨，不如

<sup>71</sup> 閒人顯然嗅到了革新保臺背後隱涵的「兩個中國」路線，並在一個中國的「認識障礙」限制下，逕用當時在中國民族主義架構下仍被「污名化」的「臺獨」來指稱它。今日的中共，則進一步把這個認識障礙當做緊箍咒來用，將任何中華民國享有主權的說法都稱做違背民族大義的「臺獨」或「獨臺」。

<sup>72</sup> 閒人，〈論「國語」與「方言」〉，頁17-19。

<sup>73</sup> 胡氏投書的內容爲：「我來美國已一年半了，我認得的大部份的留學生總是在出國後稍微觀察分析一下就開始爲臺灣獨立運動獻身獻力奮鬥。我個人則反對他們的做法，因爲臺獨所標榜的是全民革命，而革命是要流血的…尤其政府容許貴誌的出刊，足以證明政府革新的決心」。見胡雲天，〈山不轉

說是諍諫我們不要對主張溫和改革運動的人採取敵對的態度，而後才能有助於防止激烈革命的發生」。最後，他們將矛頭再度指回現況：「今天部分國內青年及多數國外留學生所瀰漫回歸認同的浪潮是因何而起？他們都是在此長大受教育的一代，而且多數又是曾被認定是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最強而可靠的一群，然而今天何以會如此？是不是都是由閒人先生『表面上』非常切合當道味口的邏輯開始發酵而形成的？」<sup>74</sup>

在前述論戰中，提倡講國語、要求有國家意識的一方，顯然是從民族的區分出發，以統一、同化為取向，認為講台語有礙民族團結，甚至進而將此與台獨聯想在一起，憂慮之情溢於言表。相對地，另一方就算有人真地讚同台灣獨立，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恐怕也不敢公開主張。從其行文來看，他們更在意的應是尊嚴的問題，<sup>75</sup>希望破除對台語的污名化，而且在爭取尊嚴和他們心目中的平等待遇時，多半是採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同樣引述中華民族的論述架構，藉強調台灣人亦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在「一個」中華民族的前提下突顯內部差異，認為唯有認真且公平地對待內部差異，而不是以粗暴的方式漠視，乃至抹煞它們，才可能有真的團結。然而，這在前者看來卻是挾眾自重的要脅。最後，《大學》的編輯群雖然沒挑戰「一個」中華民族的前提，但明白指出，若一味追求認同，卻無具體內容，只會導致認同中共的不良後果，不如腳踏實地從台灣現實出發。

前述的論戰雖觸及了台獨的議題，但仍屬隱約而間接，且多半應是從原生論的角度、從血緣性的民族論來界定台獨，而這的確也是海外台獨論述最初的主要類型。<sup>76</sup>不過，自彭明敏等 1964 年提出〈台灣自救宣言〉以來，「自決」的主張開始在關於台灣前途的討論中被提出，並慢慢形成一套有別於民族獨立論述的民主獨立論述。<sup>77</sup>1971 年 12 月 16 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對國是的建議

---

路轉？〉，《大學》，期64（1973），頁3-5。

<sup>74</sup> 本社編輯部，〈為「冷靜湊熱鬧」一文給「閒人」先生的信〉，頁20-21。

<sup>75</sup> 或許是受到不同歷史及生活經驗的制約，論爭的另一方似乎完全無法感受到本省人的屈辱感和對尊嚴的在意，乃至繼續用他們備感厭惡的自大或嘲弄口吻來談問題，像「憑什麼臺省同胞要比其他三十五省的人要老實勤勉些？」，以及若各省皆獨立成國的話，「臺灣還是最小的一『國』呢！」。反過來，本省人自覺委屈的心理則表現在陳少廷，〈再論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大學》，期47（1971），頁97，與此論戰無直接關係，但同樣觸及省籍議題的說法中：「二十五年來，我們能把臺灣建設成國家復興的基地，政府的領導有方固不待言，但本省同胞的貢獻和犧牲，功也不可沒。所以該讓本省人在中央政治機構良有更多的發言權。**我們必須深切的體認到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而中國的一切，本省人也都有份啊！**」

<sup>76</sup> 如見黃昭堂，《台灣那想那利斯文》（台北：前衛，1998），頁77-84。

<sup>77</sup> 以沈君山在安娜堡「國是大會」上的發言為例，在表示「談到台灣的前途，應以台灣本身的利害歸趨為主，台灣的命運也應由與台灣切身利益有關的人士來決定」後，主要也是針對革命的暴力手段和可行性而不是台灣民族論來反駁：「許多朋友都表示，既然不能接受共產主義，那還不如走台獨路線來得光明正大。台獨所揭櫫的理想，建設一個民主富強的台灣，理論上是令人嚮往的；但對他們

與聲明〉，在呼應國會全面改選的主張，建議政府藉此「澈底革新內政以維護我國在國際間的聲譽與地位」之外，率先表示「反對任何國家罔顧台灣地區一千五百萬人民的人權與意志…人權既是上帝所賜予，人民自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sup>78</sup>

1972年1月10日，1970年才出獄的雷震發表〈救亡圖存獻議〉，提出「改制以自保」的兩個中國模式，主張將國號改為「中華民主台灣國」，認為這樣的「台灣獨立，是對『共匪』獨立，並不是對『中華民國』獨立」，唯有如此才能讓中共無法吞併台灣，確保繼承了中華民國的法統，但僅以台灣地區的人民與領土為限成立的國家在法理上的獨立。<sup>79</sup>同年3月，《臺大法言》發表社論〈我們的命運〉，主張「我們必須向國際上所謂的『有權決定臺灣命運』者提出警告。任何臺灣未來可能的命運，均不得違反臺灣同胞的自由意識…任何違反臺灣同胞民意的決定將不會為我們所接受。而且我們深信，也只有在臺灣的一千四百萬同胞才有權、有能力決定臺灣的命運」。<sup>80</sup>9月，因應美日在檀香山會談「臺灣問題」，七所大專院校的46位同學循著相同的思考軸線，連署發表〈我們自己的命運由我們自己決定〉，認為「不管聯合國席位的有無，我們仍然堅強的屹立在西太平洋，這是誰也無法抹煞的事實」，聲言「對中華民國前途的任何決定，不容違反在此一千五百萬人民的自由意志。任何背離此一原則的嘗試，只有導致沒

---

要使革命成功實際上必須採取的途徑，則令人不能不表示反對。原因是：台灣現在沒有社會革命的條件…農民是最好說話的，不到沒有飯吃，欺榨得實在不像話，不會揭竿而起…台灣的工人階級本來就很薄弱，而其中生活最辛苦、最具有鋌而走險條件的是大陸上來的義民和退伍軍人，但以他們的背景，絕不會接受台獨領導…台灣的學生，先有升學考試的催迫，後有留學…先天後天都不足以言革命。社會革命的條件既不存在，只有民族革命。事實上台獨最大的希望恐怕還是寄託在兵變式的軍隊革命，而煽動中下級士兵最有力的口號也是民族仇恨。基於省籍隔膜而煽起的革命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對一般老百姓而言，政治的意義又遠不如經濟的意義實在，有沒有反對黨、總統是不是萬世一系…對一般群眾，這太遙遠了。所以在目前情況下，要爭取群眾武力革命，至少其手段非得借重省籍意識不可…假若付出這麼多代價，真能換得一個富強獨立的理想，倒也有可說的，無奈台獨除了標榜這個仙境的目標外，如何從革命後的廢墟上站立起來，沒有一個切合實際的解答…虎視眈眈的中共也絕不會因為推翻了國民政府，成立了台灣國就會放棄解放台灣…此所以在今日之台灣，協助督促現有政府作澈底的改革，或許比獨立革命為更實際之途徑，以後者所得者微而所失者大，為推翻一家一族之政權而犧牲數百萬同胞之安全，無論如何是不值得的」。見沈君山，《尋津集》，頁19-20。

<sup>78</sup> 林本炫，〈宗教團體與政府關係之研究〉，（台北市：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頁77。

<sup>79</sup> 田欣，〈「外省人」自由主義者對「台灣前途」的態度 - 以雷震、殷海光及傅正為例〉，收入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台北市：吳三連先生基金會：1996），頁334-35。

<sup>80</sup>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頁165-66。該文最初的標題是「臺灣的命運」，但因校方認為用臺灣兩字即有「臺獨」之嫌，故奉命改題。

有必要而且殘酷的悲劇」。<sup>81</sup>

到張俊宏於1973年底參選台北市議員時，更公開散發五十萬份傳單，直接且正面地論題化台獨，並重新界定台獨，以反制說他是「偏激台獨份子」的抹黑：「一、政治主權式的台獨：假如台灣獨立是指不願接受共匪統治，與大陸分離而獨存，那麼國民黨政府二十八年來的努力，不正是這個路線的證明嗎？二、民權運動式的台獨：如果這是指台灣民眾為爭取民權的自由，為提高政治上的發言地位，而所做的溫和民權運動，又有什麼不可呢？…三、武裝革命式的台獨：如果這是像日本與美國的『台灣獨立運動』的激進份子，主張以武力奪取政權，倡導以流血來改造社會；張俊宏果真贊同這種暴力的革命方式，又何必笨到來參加選舉呢？參加選舉就是表示尊重現存的政治制度與登錄人才的方式，既然同意當前的政治制度，又何必採用流血方式來推翻目前的政治制度呢？」<sup>82</sup>

### 三、出路：「革新保台」

#### （一）偶連中的必然？

在統、獨論述（和平統一、民族主義、兩個中國、人民自決、台灣民族、暴力台獨、主權台獨等）的兩路夾殺下，<sup>83</sup>國民黨唯一可有的出路已呼之欲出。雖然在陽的一面沒有人敢挑戰「統一」的神主牌，連敢公開主張「兩個中國」的都寥寥無幾，<sup>84</sup>但在陰的、務實的一面，國民黨自己也知反攻無望。蔣經國在1973

---

<sup>81</sup> 臺大、政大、成大、交大、淡江、文化學院、高雄醫學院等校同校46位同學署名，〈我們自己的命運由我們自己決定〉，《大學》，期57（1972），頁25。

<sup>82</sup> 張俊宏，《我的沈思與奮鬥》，頁125-26。

<sup>83</sup> 張俊宏，《我的沈思與奮鬥》，頁45，在與國民黨的座談中也提到，《明報》之所以在海外暢銷，是因其有水準，如不能提供類似《大學》水準的刊物，海外市場的空檔勢將為共黨及第三勢力的刊物所取代。

<sup>84</sup> 王曉波在日後的訪談中表示：「當時社會上民眾的思想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小市民型』，這些人認為國家社會的現狀很令人滿意，不需要改革，對外則依賴美、日，主張『兩個中國』政策，維持現狀，所以這一類實為駝鳥派。第二類則為挾外派，他們認為當時的社會還算差強人意，最重要的，台灣要得到美、日的幫助，否則沒有生存的機會。最好台灣成為美國的一州，至少，得為一保護國…第三類則是主張中國人要開創中國的路，不依賴外力，依靠自己的民眾才是真正力量的根源，並且也才能得道多助。」見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上》，頁168。以維持現狀為主張「兩個中國」，反映出這其實是王氏自己特有的觀點。不難想像多數民眾會傾向維持現狀，而沒有特定想法，稱之為「小市民」似也顯示出其為主流之意。然而王氏使用這個詞彙，應是來自〈小市民的心聲〉，明諷持此想法的人滿意現狀、不求改革。若據此認為當時主張兩個中國的小市民是主流，將是極大誤解。當時私底下或許有不少有識之士期望能實現「兩個中國」，先求確保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地位，至於統一與否則留待將來，但像雷震般敢冒統治者之大不諱明白提出此建言者，實屈指可數。以前面曾提及對此問題有深入分析的黃祝貴為例，他在討論未來可能性

年4月以行政院長身份接受金庸訪問時便坦誠表示，國民黨絕不與中共和談，因為「在目前的形勢下，很明顯是北京強而台北弱，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進行真正公正和平的會談。對我們來說，和談就是『投降』，但真是這樣的話，也就不需要搞什麼和談了」。<sup>85</sup>由於國府絕不投降，但又和中共一樣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決不搞什麼「台灣獨立」，於是，在排除統一與獨立兩個選項後，國府最後不得不呼應「革新保台」論述。<sup>86</sup>也由於國民黨連「兩個中國」模式的「獨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個完整的主權獨立國家，而不是國家未統一、主權仍有欠缺的不完整國家，即張俊宏所謂政治主權式的台獨）都無法接受，所以也只能做到革新保台的地步，而無法解決內戰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成為國際上獲承認的、法理上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領土僅限於台澎金馬）。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會採取本土化的政策來正當化自己的統治，毋寧是歷史偶連性匯聚下不得不的必要措施。

就是仍奢望統一，並非按民主理念，而是以傳統「求言」模式來看待民間改革言論的丘宏達，在退出聯合國後也同樣指出，「至少對中央級民意機關，在自由地區及職業團體部份，依憲法規定定期改選以團結所有的力量來克服難關，並且要避免採取一些不必要的措施，來影響安定」。<sup>87</sup>在喪失外部正當性，內又潛伏有省籍對立的火藥庫的情況下，賦予本省人一定的政治參與機會，藉涵括來化解危機，實是不可少的手段。因為這不但可以建立民主統治的正當性，又可舒緩省籍對立。更重要的是，自遭逢外部正當性危機以來，國內輿論主要的異議聲音便是朝此「革新保台」的方向論述，如此做恰好回應了內部的改革要求，才能真正消解政權不穩及欠缺正當性的危機。

1971年5月，當主權的問題從釣魚臺延伸至台灣，正式引爆國民黨內外正當性危機時，《大學》仍堅決而一致地支持政府，立刻以「本刊編委會」之名，臨時在保釣專號中插入〈駁斥所謂臺灣法律地位未定的謬論〉一文，<sup>88</sup>強調不管美國「再發表多少關於臺灣的謬論，再收買多少無恥的漢奸，臺灣是中國的領土這一鐵的事實是絕對不會改變的」。同期〈我國大專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紀實〉在文末探討此次保釣遊行示威的影響時，亦優先提及，由於「支持政府，保衛釣魚台」是此次運動的顯著目標，所以「全國青年才能大團結，發揮無比的力量，這給居心叵測的分離份子以嚴重的打擊，亦可見分離份子不見容於中國青年之前」。<sup>89</sup>

---

時，最後亦不得不行禮如儀地說，「從長期看，誠如嚴副總統所說：中國遲早會統一！」。黃祝貴教授講，林寬達、劉慧美記錄，〈「尼週公報」後的我國局勢〉，頁17。

<sup>85</sup> 傅國涌，《金庸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頁297。

<sup>86</sup> 沈君山在海外提倡「革新保台」時，不少人即因其家庭背景而將此主張看成是國民黨策動的。見沈君山，《尋津集》，頁178-179。

<sup>87</sup> 丘宏達，〈我國退出聯合國後所面臨的問題〉，頁16。

<sup>88</sup> 《大學》，期41（1971），頁2-6。

<sup>89</sup> 李中民、吳瓊恩、馮浩彬，〈我國大專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紀實〉，《大學》，期41（1971），頁15。

然而，如前面已提過的，從7月的43期起，《大學》關注的焦點更在於內部問題的檢討。在編委會繼續表態支持政府，反對美日侵略釣魚台的同時，他們呼籲當局「拿出非常氣魄，徹底地革除一切積弊，起用有真才、有膽識的新人，來共同建立各項現代化的制度，並開放公平的發展機會。我們堅信，只有從內政的徹底革新上著手，才能厚植國力，抵禦外侮！」<sup>90</sup>自同期起連載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文，<sup>91</sup>則對政權的社會基礎進行分析，研判各類人對執政當局的態度，剖析可能導致不穩定的根源何在。儘管這樣的分析可能是出自謀國的赤誠，用四位作者的話來說，即是「希望藉著這種分析能幫助大家更深入掌握臺灣社會的『力源』，擴大它，培育它，使我們社會的各種階層各種潛力從根本上建立起鞏固而深厚的基礎，使我們從此能卻除社會風暴的恐懼感」。但看在統治者的眼中，這恐怕卻是個具威嚇性的分析，因為在指出當前力源與問題何在時，這篇文章揭露了統治的秘密，從而有啓蒙的效果，讓被統治者知道如何反抗。<sup>92</sup>

例如，〈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文指出，歷經土地改革和地方選舉的篩汰，原為維繫舊社會安定的舊式地主雖多已消聲匿跡，但他們在原有的生活圈中仍是意見領袖，可是國府始終未積極爭取他們支持，其措施也未能令他們滿意，所以他們發揮的殘存影響力都是往和政府相反的方向發展，在聽到有人批評他們接受「奴化教育」時，更會激起無名火。至於龐大的農村外流人力，在都市久居，會濃烈地感到貧富不均的壓力，當他們想爭脫貧窮時，卻會感受到太多的障礙與困擾，因此潛意識裡逐漸萌發盲目的敵對心理，每到選舉時，便跟隨著「街頭政治家」狂熱奔跑、吶喊，是一股具爆炸性的力量。出身農村的智識青年，在步出校門後，因缺乏關係、背景，無緣晉升，並在尊嚴上受挫，才會產生地域觀念和濃厚的政治意識，傾向支持任何改革。掙扎於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落差間的智識青年雖對現實極端不滿和不平，但不會輕易表達，絕不可愚蠢到對他們採取激烈手段，否則將迅速地使正在尋找發洩對象的青年們凝具其不滿的目標，一旦此非常手段成為青年們發洩情緒的焦點，將不可能有任何堤防足以抵禦這如怒濤排壑的力量。而無組織的爆炸性失業男性勞工，更是暴民運動中最主要的暴力來源，暴

---

該文以分離份子為首要討伐的對象，可見統獨在當時已是個爭議。國民黨其實很早便擔心本、外省人士合作及分離主義的問題，也因此才會鎮壓《自由中國》及逮捕蘇東啓。見蘇瑞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台北：稻鄉，2005）；謝漢儒，《早期台灣民主運動與雷震紀事－為歷史留見證》（台北：桂冠，2002）；陳儀深，〈臺獨叛亂的虛擬與真實〉。

<sup>90</sup> 本社編委會，〈嚴厲警告美日政府侵略釣魚台聲明〉，《大學》，期43（1971），頁2-3。

<sup>91</sup> 張紹文、許仁真（按許信良）、包青天（按包奕洪）、張景涵（按張俊宏），〈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大學》，期43（1971），頁32-35；期44（1971），頁14-25；期45（1971），頁20-26。

<sup>92</sup> 在後來的座談會上，馬凱便覺得此文有「喧染誇大之處，由於問題本身已經具有爆炸性，如果不能客觀、謹慎，便會令人覺得它的動機祇是在製造不安的氣氛與不滿的情緒」，身為社長的陳少廷亦批評該文「缺乏科學的論證和分析」，指「群眾運動經常是由受挫折的人，尤其是知識份子之煽動而引起的」，委婉暗示應做嚴謹的科學分析，而不是以生動優美的文字來煽動。見〈「臺灣社會力的分析」座談會紀錄〉，《大學》，期48（1971），頁33，41。

亂的導火線。當他們的苦悶積累到某一種程度時，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的意外事件，都可能使他們形成暴亂的逆流。唯有「工會」才能防患工人成爲猛獸，馴服這條猛獸成爲建設的力量。

儘管〈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文曾引起國民黨政權中部分人士的不滿，但《大學》並未因此而退縮，到下一期討論「外交問題」時，強調內部革新以圖外部生存的取向反而更爲明顯。許漢傑說：「光復大陸後，我們毫無疑問是世界上的頭等強國！可是我們今天所能確確實實掌握的自由基地的力量，充其量只是世界上的三等國家。這是殘酷的現實…我們不可能長期強充強國，也無力長期擔負強國的國際義務…在光復大陸前…我們的外交目標應該只有一個：就是用最大的努力，花最低的代價來確保自由基地的安全與安定。其他任何目標，不管多麼堂皇，都是次要的。老實說，即使中共進入聯合國，也並不是我們的末日，更不會成爲中國人追求自由大業的障礙」。在文章最末，他更表示，「在今天的自由基地上，我們有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好機運，讓我們不要浪費力氣責備尼克森，讓我們大膽拋棄唐吉訶德的包袱，讓我們全心全力地來爲我們可憐的老祖先實現他們三千年來的美夢」。<sup>93</sup>這篇充滿台灣本位色彩的文章可說是革新保台論述的定調，<sup>94</sup>而且自此以後，此一取向在《大學》內部便逐漸取得主導權。<sup>95</sup>

雖然接下來 45 期的「人口問題」專號並無延續此一取向的文章，但隨著退出聯合國的鉅變，《大學》在 46 期刊出〈國是諍言〉，不但再次強調革新保台的取向，還突顯自己省籍合作的色彩：「我們都是在此地成長的一群青年（雖然彼此的省籍不盡同），此地的命運決定我們個人的前途。有權利爲自己的生存命運發言…我們所面臨的危機是如何尋求自保的問題。因而，目前所應努力的事，便是自保圖強…實現中國統一是我們最大的理想與奮鬥的目標，然而目前我們所急切要做的是：如何把台灣搞好…如何把臺灣建設成一個可讓中國人嚮往的樂土，這是大家目前可以做的，而且應以全部精力作投注的大目標…如果不圖自

<sup>93</sup> 許漢傑，〈不必只顧責備尼克森。形勢是客觀的，成之於人。力量是主觀的，操之於我。〉，《大學》，期44（1971），頁2-3。

<sup>94</sup> 王人傑，〈對外交上的一些小意見〉，《大學》，期44（1971），頁4，亦說「立國之道，首在內政修明，國富則力強，若內政良好，因外交而亡國者實不多見」，批評國府過份信賴美國，缺乏獨立自主，富機動性的外交，主張擺脫「集團外交」，加強雙邊外交。根據1972年3月蘇聯媒體刊載國民黨十屆三中全會的消息，引發中共新華社的強烈譴責來看，國府檯面下或曾試過打蘇聯牌。見張作錦，〈蘇俄一雜誌登載三中全會新聞 新時代週刊此舉 曾遭匪方謾罵〉，《聯合報》，1972年4月5日，第三版。

<sup>95</sup> 這同時反映在《大學》開始刊登介紹台灣歷史的文章。最早一篇是「七七事變與抗日運動」專號中，陳少廷，〈林獻堂先生與「祖國事件」－兼論臺灣智識份子抗日運動的歷史意義〉，《大學》，期43（1971），頁4-8；接著有黎風〈認識客家〉，《大學》，期44（1971），頁26-31；陳少廷〈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大學》，期53（1972），頁18-34；包青天輯〈「西螺七劍」真傳淺說〉，《大學》，期58（1972），頁63-67；陳少廷，〈日據時代的台灣醫生－台灣醫師在啓蒙運動上的角色〉，《大學》，期60（1972），頁62-67。

強，我們對大陸就永遠只能情緒上的擁有，甚至於我們將無以自存」。<sup>96</sup>同時，該文更升高批判的火力，指「領導階層觀念智識的閉塞，新陳代謝的呆滯，在革新上造成嚴重的障礙，這才是危機的核心」。「二十年前由於政局動盪，社會紊亂，內部潛伏了種種不安，政府自應借重軍警的力量來維持安定」，但如今台灣已「進入了初期工業化的社會，再加上教育的普及與提高…面對這種新的情勢，顯然已經不能完全依靠軍警的力量來維持安定了」，要求徹底變動「**老大而終身化的高民意代表群**」，以新國人耳目。<sup>97</sup>

如陳鼓應日後分析的，此文「基本上仍循著傳統書生『獻策式』的從上而下的改良心態，但…已觸及到國府統治合法性及代表性的問題」。<sup>98</sup>《大學》雖然對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已多有質疑，最後卻選擇支持它，只提出革新保台的要求，其背後的思路與心態清楚地呈現在主動轉載郭榮趙同年9月16日刊於聯合報的文章中：「所謂臺灣獨立不是辦法，事實上也不可能」，而認為在中共治下可得到某種滿足或好處，卻又只是幻想。「今天在臺灣的人們，無論任何省籍，都要認清在中共的屠刀之下決沒有任何優待可言」，大家的命運、處境、目標都是一樣的。所以儘管對國民黨有所不滿，仍應團結在它的四周，督促它做徹底的革新，「因為救國民黨就是自救之路」，「到目前為止，它還是唯一可以抵抗中共暴虐最強的一股勢力」。<sup>99</sup>

由於國民黨這個特殊政權的命運已與眾人的普遍命運掛鉤在一起，正是為了自救，《大學》才會呼應當局團結的要求，但認為唯有革新才能創造團結。陳少廷在呼籲國會全面改選的文中便說：「我們今天迫切需要一致的團結。而真正的團結，只存在一個開放性的民主政治之下才能獲得。基於此，為了擴大民主基

---

<sup>96</sup> 張俊宏在日後的追述中，亦特別強調省籍合作是成員的共識，在內部出現紛爭時，還曾成功地以這個理由說服楊國樞繼續擔任總編輯。但他認為後來因外省籍者擔心雜誌辦好後，法律所有權卻在本省人手中，開始有爭議。見張俊宏《我的沈思與奮鬥：兩個煎熬的日子》，頁86以後。相對地，楊國樞在日後的訪談中則從參與者個性不同和企業化、制度化的問題等較單純、不涉政治的角度來看，表示是《大學》名聲建立後，有些本不是編委會的人想管得比較多，因此才引起紛爭。另外，蘇俊雄在訪談中也表示，參與《大學》的外省籍知識份子多已接受本土化，但並沒有否定大陸省籍的關係，他們有本土化的看法，認同現實的路線，但無省籍情結、國家認同等情形。楊、蘇的訪談見秦鳳英，〈知識菁英對威權體制民主化之影響研究－台灣「大學雜誌」個案分析〉（台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a-20，a-29。最後，可比對陳少廷、陳達弘，《政治蒼蠅的嘴臉》，頁7-10，帶有個人恩怨的說法，及參照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收入南方朔，《自由主義的反思批判》（台北：風雲時代），頁115-76，土／洋區分的分析。

<sup>97</sup> 〈建國六十週年紀念：國是諍言〉，《大學》，期46（1971），頁1-12。

<sup>98</sup> 陳鼓應，〈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新生一代的改革運動（上）〉，《中報月刊》，期5（1982），頁2235。按〈國是諍言〉後附有讀者意見調查表，逐段詢問對該文主張的看法，所以當時《大學》成員或許曾想有進一步的作為。但該刊日後並未刊出調查的結果，其原因為何仍有待追查。

<sup>99</sup> 郭榮趙，〈一個歷史工作者對時局的反省〉，《大學》，期46（1971），頁18。

礎，永保政治活力，並鞏固團結起來，我們亟須在自由地區及海外僑界辦理中央級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sup>100</sup>所以，《大學》雖然同意救國民黨以自救，但認為只有「改革」才能「救」國民黨，並非毫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現政權。〈國是諍言〉在結語時便說：「一個政府假若無力領導人民實現這種理想，最低限度也不應該阻礙這種潮流的發展。（任何順應此一潮流的政府必能一帆風順與堅強壯大，而阻礙這種潮流的政府則終將為潮流所淹沒）」。<sup>101</sup>

正是考慮到改革才能團結、才能自救，所以《大學》鼓起勇氣論題化了長久以來有礙內部團結，但在威權統治下卻是人們諱言的禁忌話題。林正弘在同期中便要求政府考慮赦免政治犯，認為溫和的「左傾份子」不過是對貧富太過懸殊有所不滿而主張計劃經濟而已。他進一步還說，許多政治犯是由大陸同胞與臺灣同胞間的摩擦產生的，但不論這是源自日據的奴化教育，還是政府接收時的不當措施，都無法解釋目前海外從事「台獨」活動者係年青一輩的事實，認為必須考察現狀是否還有導致省籍隔閡的因素，並指「大陸同胞在言行上有意無意間所表現出來的優越感，往往使臺籍青年產生極大反應」，「大部分的臺灣同胞，尤其是老一輩的，都把政府看做是大陸人的代表…把某些（甚至某幾個）大陸人的不滿轉移為對政府的不滿」。<sup>102</sup>

陳少廷在與之相呼應，並特別標出「本省青年」對國是的意見的文中，在指出貧富懸殊會引起經濟及政治的惡性循環，期盼政府本民生主義的原則，擬定造福農工大眾的社會福利政策外，亦表示造成地域歧見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人們「始終在心理上覺得有一種無形的『政治歧見』之存在」，「對權貴後裔的禮遇跟對庶民子弟的漠視，形成強烈的對比」，而「明星式」培植本省青年，在尚未對本省青年收到普遍號召之利前，卻很容易先使外省青年才俊產生「此處不留爺」的錯覺。最後，他呼應早先張景涵的說法，認為應以機會平等來「促成本省和外省青年的認同與團結」。<sup>103</sup>

## （二）團結共赴國難？

從前面的討論不難看出，當外部正當性危機升高時，《大學》並未採取較單純的「退出」策略，而是選擇投入，在獻上一定「忠誠」的前提下表達改革的「異議」，並趁此機會提高發聲的分貝。<sup>104</sup>不過，即便它的成員開始敢質疑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論題化敏感的階級與省籍問題，但多只敢援引或挪用三民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作為論述的資源與元素。因為在當時的時空條件下，無論他們自己相

<sup>100</sup> 陳少廷，〈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 - 兼評周道濟先生的方案〉，《大學》，期46（1971），頁14。

<sup>101</sup> 〈建國六十週年紀念：國是諍言〉，頁10。

<sup>102</sup> 林正弘，〈籲請政府考慮赦免政治犯〉，《大學》，期46（1971），頁20-21。另見註116所引沈君山的訪談紀錄。

<sup>103</sup> 陳少廷，〈一個本省青年對國是問題的幾點意見〉，《大學》，期46（1971），頁23。

<sup>104</sup>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信與否，這不但是保護自己的策略，也有助於強化論述的說服力與可信度。像陳少廷在主張國會全面改選，反駁制式的法統論述時便說，「我們又何可受拘於法律條文的外殼，而無視於三民主義民主憲政的精神」；<sup>105</sup>張宏遠則質疑「我們推行的是資本主義式的三民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式的三民主義！…爲了推行三民主義救中國，所以我們必須反共，但是主要是反它的目的呢？還是反它的手段，是反它的過去呢，還是反它的現在與未來？是反它的方法呢？還是反它的成果！」。<sup>106</sup>然而，國會全面改選的主張終究對國民黨向來以之爲憑藉的「一個中國」與法統論述構成正面挑戰，而且革新保台的路線現實上極可能往兩個中國的方向發展。所以，在《大學》提高異議的分貝後，這也就改變了它與國民黨中改革勢力的結盟關係，其成員中較親黨國立場者如關中、丘宏達等在態度上開始趨於保留，減低參與的程度，終至退出。<sup>107</sup>

無論《大學》是否覺察到它與蔣經國的結盟關係開始有了裂痕，它至少在反抗中共統一台灣上仍與國民黨有共同點，因此願意共赴國難，暫時團結一致對外。這種心態毋寧是革新保台論述的普遍社會基礎，並清楚地表現在下一期以「本社編委會」之名刊出的〈信心、決心、革新：我們的呼籲〉中：「發奮圖強的根本途徑仍然要從內部的政治革新和經濟建設做起，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是自救圖存所必須遵循的道路，也是海內外同胞一致的願望…目前，朝野一致的震驚和悲痛的情緒已掩蓋了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種種歧見，更加強了國內外同胞患難與共的感情，這實在是二十年來另一個結合全民發奮圖強的大好時機…現代中國人絕不能爲了暫時補償其百年來在自尊心上所受的創痛，而爲中共所宣揚的畫面所迷惑，否則必將中國導入另一個新的悲劇」。他們表示「願全力擁護政府革新圖強」，因爲「這個海島乃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存續的命脈所繫」。不過，除了明示原有內部分歧只是因爲外部危機而暫時掩蓋或擱下之外，該文還不忘舉法國大革命後的波旁王室爲例委婉警告，若國府不能把握機會積極作爲，「這些期待的眼光，久而久之恐怕難免將形成一種疏離的情緒」，<sup>108</sup>暗示國民黨若不順勢改革，不但會喪失支持，還有導致武力反叛的危險。<sup>109</sup>從前述 1970 年代初的確有

<sup>105</sup> 陳少廷，〈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頁14。

<sup>106</sup> 張宏遠，〈說幾句內心的話〉，《大學》，期47（1971），頁17-19。

<sup>107</sup> 但內部紛爭正式引爆，以及與國民黨摩擦的表面化，應是在1972年1月刊登〈國是九論〉及主張開放學生運動後。《大學》成員在出刊後應已嗅到氣氛不對，所以下一期（50期）的內容不但批判火力有所減弱，而且隱然有改由學生帶頭衝的味道，主要以轉載學生的文章爲主。同時，也就是2月時，國民黨正式向《大學》表達不悅，要求降低言論敏感度，丘宏達、關中、施啓揚等較親黨國立場者亦在內部要求調整編輯策略，否則將退出。《大學》因此脫了一期，到4月才推出51、52期合集。丘等人後來雖未因此事而退出，但不再如以前般積極。見張俊宏，《我的沈思與奮鬥》，頁82-90；秦鳳英，〈知識菁英對威權體制民主化之影響研究〉，頁95以後；洪三雄，《烽火杜鵑城》，第七章。

<sup>108</sup> 社編委會，〈信心、決心、革新：我們的呼籲〉，《大學》，期47（1971），頁3-5。

<sup>109</sup> 《大學》其實一再提出這樣的暗示，除文中已提及者外，像陳少廷先是在與周道濟的辯論中說，「我是怕這樣長期保持原狀繼續下去，一旦不幸發生流血事件，就是大家共同滅亡」（〈全面改選中央

暴力革命事件來看，這不純是危言聳聽。

反過來，對國民黨來說，儘管統一和中國民族主義是它一向掛在口上的倡議，但這時它一樣不願看到民族主義的過度高漲，甚至極為害怕人民因民族主義的情愫和求統一、富強的心理而倒向中共。<sup>110</sup>所以，它雖無法接受兩個中國的做法，但同樣會想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大框架下突顯「治台」的現實，呼應「保台」的主張。也正是基於這樣的心理，雙方在愛國的基調下多迴避直接論題化國家和主權的問題，轉而只談民族與文化，強調外來的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中華民族不合。<sup>111</sup>海外釣運轉向統運，顯然是促成此一微妙心理轉折的原因。<sup>112</sup>王台生便表示，中共已偵悉我政府與知識份子間有差距，「而欲擴大這種『差距』，作為其『解放臺灣』的第一步。並且我們還不能不承認敵人的這項陰謀，在海外已達

---

民意代表辯論》，《大學》，期49（1972），頁87），繼而在申論的文章中用粗體強調，「**我們都知道，當溫和的改革不幸失敗後，政府和人民都要再付出更大的犧牲**」（〈再論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大學》，期49（1972），頁97）。在「對日經濟關係座談會」上，金神保在未引述托克維爾名字的情況下，也再次提醒當局注意期望與經濟發展的差距的問題，指出革命往往發生在期望與實際生活間出現太大落差時，認為台灣尚未達到期望值的飽和點，更應以此為鑑。見〈我國對日經濟關係座談會〉，《大學》，期58（1972），頁10。

<sup>110</sup> 在海外保釣已起，但尚未傳入國內時，王順，〈「譯後記」的後記〉，《大學》，期37（1971），頁57，便說：「我們對民族主義有信心，就不能對釣魚台事件緘默」。當時國府的處境固極為尷尬，難有什麼大動作，但衡諸它在整件事情上的軟弱與低調，恐怕多少反證了它對民族主義沒什麼信心。另外，統治當局在1970年代晚期的文宣品中，將存在主義、行為科學、和平思想、民族意識、鄉土觀念、反戰意識、國共和談、三十年代文藝、分歧意識等全列為中共採用的統戰方式，更足以證明國民黨對民族主義的潛在畏懼與矛盾心態。見時事周報社編印，《競選方法與技術》（台北市：時事周報社，1978），頁11-15。

<sup>111</sup> 這明顯呈現在劉述先，〈論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後的形勢與海外中國人的認同問題〉，《大學》，期49（1972），頁50-53；許冠三〈「認同中國」所涉及的幾個思想問題〉，《大學》，期51、52合集，頁18-19；唐君毅，〈論中國現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的方向與海外中國知識份子對當前時代之態度〉，《大學》，期59（1972），頁22-33；及張曼濤，〈中國文化與中國前途〉，《大學》，期59（1972），頁34-40等文中。張曼濤甚至樂觀地表示：「當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碰擊在一起的時候，就必定產生一種拳擊式的勝負，誰能持久，誰就是最後的勝利者！中國文化的柔性與消融性既有那麼大，我們當然可以看重她，必定就是持久者，她能持久，那她自然就是勝利者！因此，為回歸中國文化與認同中國問題而煩惱的朋友們不必擔心」。此一論述軸線某個程度上是延續1960年代以來，國府為對抗中共文化大革命所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為國府接下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論述鋪路。此外，《大學》原本對傳統文化較持檢討、批判繼承的態度（例如見黃岷刊於15及18期的〈近百年來中國現代化的過程〉，21期章經的〈從怕太太談到專制與民主〉，以及38到40期李學叡檢討傳統教條的系列文章），但在以中共為共同敵人後，肯定傳統文化的文章顯著增加。

<sup>112</sup> 沈君山，《尋津集》，頁177，也提到，他是在釣運轉變為統運後，才熱烈參與的提出「革新保台、志願統一」的主張，並發現當很多台籍同鄉可以接受把「革新保台」當做一個程序，但略過「志願統一」不談。

到了其相當程度的目的。但我們絕不能讓這項陰謀在臺灣得逞！」<sup>113</sup>不僅如此，《大學》還一反先前反對政府抹黑海外保釣的做法，主動刊登「紐約保釣會造反總部」發給他們「同志們」的信，和徐守騰的「自白書」，以證明保釣「絕不是如一些人所說的中共不是幕後的支持者」。<sup>114</sup>

了解此一背景，便不難理解《大學》為何會在下一期推出〈國是九論〉，持續加強異議的聲浪，要求落實從人權、人事制度、外交、經濟、農業、社會福利、教育、地方政治到青年等方面的改革的同時，又公開點名海外統一論述進行批判。在〈與國外留學生冷靜談國是〉文中，張景涵、包青天（包奕洪）、許仁真（許信良）、鄧維楨等人一開始還能冷靜分析，認為海外留學生之所以會變得無保留地歌頌毛共政權，甚至認為中共殘殺數千萬中國人的行為是合理且必要的，其問題根源在於母社會：「中國近代以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始終過份地偏重於物質上的現代化，而從不重視思想意識形態的現代化…在意識的改變過程中，每遭受過一次失敗的經驗，便一次比一次地往後撤退，而產生更嚴重的『回歸』運動…一次比一次更顯得落後、頑強、保守和畏懼」。<sup>115</sup>由於留學生本就是帶著分裂的破碎心靈出國，到西方社會後又會面臨難以適應的問題，而在心理上感受到最嚴重的震撼，因此「從各種角度上，他都需要重新抓住一個巨大的權威偶像來崇拜，以加強其認同，一方面得以改善其在西方社會的處境，二方面也必須使他畸零而破碎的心靈獲得強有力的歸屬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找到了毛共的偶像，他們原本不贊成共產主義，而今百般無奈之中一旦這個權威成為他們心理上投靠的避風港，勢必改變自己加速其認同」。

但在聲明「統一仍然是我們所需要的，但做為一個現代的中國人，必須清楚地認清：統一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遠比單純盲目地要求統一更為重要」後，他們便展開熱烈的反擊，為「保台」路線進行強力辯護：假如以那些在台灣參加實際建設、默默耕耘的一千五百萬中國人「拿了外人的錢在自己國土從事自己的建設也夠得上『漢奸』罪名的話，那麼在『帝國主義』的疆域上拿『帝國主義』的獎學金和俸給為『帝國主義』者效勞的人們，恐怕更要先慚愧得無地自容了…臺灣早已夠不上做列強的『籌碼』了，季辛吉玩弄國際權力均衡論的『籌碼』乃在毛共政權…『反帝』反得最激烈的『民族主義者』毛澤東，不是已經邀請『美帝』的領袖往訪北平了嗎？…少數留學生們過去跟隨美帝反共，而今又跟隨美帝親共，假如在默默奮鬥的人可稱『美帝工具』的話，那麼左傾留學生的這種行為恐怕是有過之無不及吧？」

同期的其他文章，以及後續幾篇討論認同問題或中國文化的文章，<sup>116</sup>也都反映出，「被中共統一」是當時多數人感到最為迫切的憂懼，也是促使立場各異

<sup>113</sup> 王台生，〈從消除政府與知識份子的差距做起〉，《大學》，期48（1971），頁51-52。

<sup>114</sup> 江放，〈兩封信〉，《大學》，期48（1971），頁74-76。

<sup>115</sup> 張景涵、包青天、許仁真、鄧維楨，〈與國外留學生冷靜談國是〉，《大學》，期49（1972），頁45-49。

<sup>116</sup> 見註110。

者得以團結在一起的公分母。<sup>117</sup>因為對他們來說，「今天，我們所要爭取的已不是國家的強大與否，我們只能在自由和奴隸之間作慎重而決定性的選擇」。<sup>118</sup>此所以陳再新在駁斥Selig Harrison日本人已放棄台灣獨立的夢想，<sup>119</sup>準備在臺灣轉向大陸時，和中共共管台灣的說法時會說，「須知『臺灣』根本沒有『轉向』共黨統治下的『大陸』之可能…臺灣之存在得自我政府之反共，也因為如此，才得到民心的支持」。<sup>120</sup>換言之，如果國民黨不反共的話，人民也不必繼續支持它。劉源俊的投書雖表示不同意〈國是諍言〉的看法，卻反映了相同的憂慮：「臺灣所面臨的問題，根本是共產主義威脅的問題。『國是諍言』一文撇去這方面不談而主張『在臺灣建設成一個祖先數千年來所夢想的樂土』，這等於是解除民眾的精神武裝。又主張在國防軍事上節流，卻不提國防科學之研究發展，這等於是解除實質的武裝。試問，這樣一個『樂土』能夠抵抗共產主義嗎？」<sup>121</sup>

就是日後堅持中國民族主義與統一立場的王曉波，當時也以麥立的筆名主張下述兩點為基本前提：「第一是中國的統一，但統一中國的必須要是中國人所能接受的政權。第二是保護臺灣，使臺灣所發展的文化政治型態成為將來中國文化多方向發展的動力」。<sup>122</sup>他進而根據這個標準對他分類的「投機的左派」、「臺獨份子」及「歸國學人」進行批評，歸結到在地改革論的立場，<sup>123</sup>「主張內政改革為第一首務」，認為應朝liberal socialism的方向思考，強調「現實上我們能做的，當是建設一個全民福利的社會，並且研究大陸的現況…有了這些和平統一中國的實力之後，我們才能談和平統一的方式…在這之前我寧願逃避這個問題，而致力

---

<sup>117</sup> 沈君山在1973年1月在美發行的《野草》的訪談中提到，「國內台籍和大陸同胞間的隔膜一直是潛伏性的、反不如老一代與年青一代的所謂代溝來得明顯。一兩年前這些隔膜有明顯的趨勢，但是這一次回去完全不同了，去年我在台時有一位很熟的學生，很有台獨的趨向，但這次找他閒聊，發現他已變成政府的擁護者。我想主要是怕中共，有這個大矛盾存在，其他一切都變成小矛盾了。國際形勢的演變使獨立可能性消失，和政府一些開明的措施也都是促使台籍人士生同舟共濟之感的原因」。見沈君山，《尋津集》，頁41。雖然我們無從判斷此一多少帶有宣傳性質的故事的可信度，但除日據以來傳統左翼的「台獨」外，台獨主張者不願接受中共統治是可信的。陳唐山在日後的訪談中便表示，在「不讓中共統治台灣」這點上與國民黨有重疊的利益，「雙方有相當一致的看法」。見《尋津集》，頁181。

<sup>118</sup> 楊庸一，〈對當局與輿論界的強烈建議〉，《大學》，期50（1972），頁14-15。

<sup>119</sup> 保釣以來的一個背景是，「右派的將日本看做救命菩薩，左派的將日本視為解放台灣最大的絆腳石」。沈君山，《尋津集》，頁22。

<sup>120</sup> 陳再新，〈駁斥英國Selig Harrison的胡言〉，《大學》，期66（1973），頁29。

<sup>121</sup> 劉源俊（美國），〈臺灣所面臨的問題，根本是共產主義威脅的問題〉，《大學》，期50（1972），頁8。

<sup>122</sup> 麥立，〈評留學生的三種政治方向〉，頁54-57。

<sup>123</sup> 郭紀舟，《7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市：海峽，1999），頁36，曾援用左派的術語，稱此為「就地革命論」。但就王氏當時公開表現出來的主張而言，皆仍在改革的架構內，看不出有任何「革命」的色彩。

於內政的改革及對大陸情況的了解」。<sup>124</sup>

後來王曉波好像還超越待機的格局，<sup>125</sup>更明白地主張在地的改革。例如他藉留學生之口說「爲什麼我們在臺灣的人不自己來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靠攏中共？」，並表示持這種論調的人愈來愈多，「反而壓過左派的氣焰」。在分析過留學生中從支持國府、支持中共、主張超越現有政權的統一論、主張臺獨到避免做政治主張的各類人等後，他下結論說，「中共在留學界並沒有得到絕對的優勢，最多只是略佔上風而已，並且大多數的人都支持政府的全面革新，並且希望以蔣經國先生的少壯派得勢以保證全面革新的成功」，<sup>126</sup>一方面呼籲改革，另一方面也是藉改革公開爲蔣經國接班助勢。

在王漢興、陳華強執筆的文章中，在區分出當時的青年可分成認同政府立場（再分改革型、漸進型與保守型）、左傾意識（再分投機的與思想的左傾者）、西化的民主主義（堅信兩黨政治是達成民主的唯一途徑）、失落的旁觀者（再分政治的冷漠者和絕緣者）和臺獨傾向五大類後，亦說青年對現實政治要求最強的就是改革的主張，而他們要求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國家尊嚴（除極端西化論者外）、人權保障、政治公平和社會正義。兩位作者在代政府策謀對策時則提及，除了讓青年感受到改革的可能性外，爲對抗中共的宣傳，「必須提出鄉土認同和社會認同，喚醒其對鄉土和社會的責任，使之產生強烈的認同感，並留下其參與建設鄉土和改造社會的可能性」。同時，要讓青年意識到中華民國的存在 – 這必須藉革新保台來確保 – 有其歷史與文化的意義，是「爲未來的中國留下一粒希望的種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sup>127</sup>

### （三）各得其解的交集

對鄉土認同的強調，<sup>128</sup>正彰顯了 1970 年代初以來民族主義、關懷現實與回歸鄉土三大趨勢的匯流，並預告了鄉土運動的風潮。<sup>129</sup>在「鄉土」一詞親近土地、

<sup>124</sup> 據鄭鴻生，《青春之歌》，頁156，的說法，劉大任、郭松棻等留學生曾組過鬆散的「台灣社會主義同盟」。

<sup>125</sup> 這種西瓜偎大邊的傳統華人心態其實頗爲常見，像1980年代兩岸初接觸時，不少台人常覺得自己高中國一等，如今則追隨全球中國熱視其爲楷模或淘金窟。

<sup>126</sup> 麥立，〈漫談留美學生的政治氣候〉，《大學》，期51、52合集，頁63-64。

<sup>127</sup> 王漢興、陳華強，〈論「青年與政治」〉，《大學》，期49（1972），頁36-44。

<sup>128</sup> 當時仍爲學生的楊庸一，〈對當局與輿論界的強烈建議〉，頁15，亦提到，「面臨對自由的選擇和對鄉土的熱愛，我們比任何時代的任何青年更熱愛這塊生長的土地…我們無法忍受眼看著這塊一千四百萬同胞居住的唯一鄉土正遭受到危難而我們卻無法給予絲毫的幫助」。可見鄉土一詞正流行開來，並成爲台灣的代名詞。事實上，早在1965年，葉石濤就已在《文星》（97期）上發表〈台灣的鄉土文學〉，但當時並未引起太多注意。見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台北市：自立晚報，1991），頁124-26。

<sup>129</sup> 林惺嶽，《臺灣美術風雲四十年》（台北市：自立晚報，1987），第四章。1971年11月，外省籍的尉

愛鄉愛國的基本意涵的基礎上，它可以充做意涵豐富的象徵使用，指涉關懷現實、關懷鄉土小人物的遭遇、重新發現民族文化與本土文化的尊嚴、正視台灣被殖民的歷史、反對過度西化、反對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反對雅俗的不當區分、反對不公義的社會現象、本真、原始或原創、富生命力等多元而分歧的面向。<sup>130</sup>對長久以來文化受壓抑，尊嚴受挫，較傾向台灣本位的本省人來說，鄉土成了跳脫統治者「地域意識、偏見」架構，取代「地方」一詞，用以指涉台灣和本土的更佳選擇。<sup>131</sup>至於中國民族主義者同樣可以在鄉土的象徵中找到關懷與實踐的立足點，因為即便是在中原本位的民族主義架構下，他們絕大多數也會堅持自己才是正統，視台灣為他們的鄉土與現實上立足的中國本土（國府所稱的「自由中國」），以及中華民族與文化存亡之所繫。<sup>132</sup>所以，鄉土既可以銜接、涵容多重的意涵與不同的強調，同時也是各種論述的交集與可相互諒解之處。

「革新保台」雖然不如「鄉土」般廣涵，但一樣可以成為多方勢力能取得妥協與相互諒解的交集。從前面引用的論述不難看出，在既有思考和期望結構與社會現實的限制下，就是主張改革者，當時多半也跳不出或不敢跳出中國民族主

---

天驄即在〈自囿 – 白先勇的「臺北人」引起的一些感想〉，《大學》，期47（1971），頁59-61，一文中，對從大陸到臺灣這一過程不過給予書中主人翁們「那一點『今不如昔』的感傷而已」表示遺憾，認為「這種死胡同的生活，雖然一向是作家慣用的題材，但是它能引導讀者到達何種境界，卻要視作者的態度而定」。並舉小孩斷奶時哭得最傷心為例，希望作者和大家經此告別的洗禮後，能「尋找出自救之道，開始再生和新生」，「寫出一部屬於這時代的巨著」。1972年2月28日，關傑明在高信疆主持的中時副刊「海外專欄」發表〈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引爆現代詩論戰。《大學》隨即於4月邀請李錫奇、何懷碩、林惺嶽、席德進等，舉辦「藝術與社會問題」座談會，探討「大家最感興趣與關心的，藝術是否反映社會」的問題，並將紀錄刊於57期。1973年7月，《龍族詩刊》更推出評論現代詩的專號。

<sup>130</sup> 林載爵，〈本土之前的鄉土 – 談一種思想的可能性的中挫〉，《聯合文學》，卷14期2（1998），頁87-92；吳介民，〈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 – 文化界公共領域之集體認同的形塑與衝突〉，收入李丁讚等，《公共領域在台灣 – 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2004），頁299-355；張釗維，《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台北市：滾石文化，2003），頁49-57。

<sup>131</sup> 相應於此一轉變，國府繼承認本土文化為地方民俗後，再將之提升為民族技藝或文化，繼續迴避以「台灣」來指稱。見楊聰榮，〈從民族國家的模式看戰後台灣的中國化〉，收入吳密察、張炎憲等《建立台灣的國民國家》（台北：前衛，1993），頁150-52。

<sup>132</sup> 用海浮子，〈中國的現狀與我們應走的道路〉，頁20，的話來說：「談國是不論及臺局固不可，論臺局而不以整個中國為目標，也是自失中國人之立場；只有以全中國為背景，纔能更顯出論臺局的價值」。沈君山，《尋津集》，頁43，的觀察則是，「海外的人說起中國，四十歲以上的在文化上和民族上都是以大陸為主體，即使四十歲以下從台灣出來的，尤其是外省人，大陸也佔很重要的分量。所以有文化上認同和政治上認同分歧的痛苦。國內年輕的一代就沒有這一套，多少把台灣當作中心，台灣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中國，中共來解放台灣，在一些人心目中不是統一，而是外來勢力的侵略，甚至在民族的意識上都會起反應。當然，這個在台灣籍人士裡更顯著，不過使我驚奇的是許多外省籍青年也這樣想」。

義的思考架構，<sup>133</sup>最多只能迂迴地嘗試確保中華民國法理上的主權獨立，（至少暫時）促成現實上的兩個中國。<sup>134</sup>然而，由於呼籲改革者沒有直接的社會基礎和動員能力，而且這樣的聲音在主事者的諸多顧忌下亦極為微弱，所以最終只能走向「一個中國」架構下，確保「中華民國」事實上主權獨立及繼續生存的「革新保台」路線。對持台灣本位的改革者來說，改革至少意謂著走出反攻大陸與法統的政治神話，正視並改善當下的現實，因此願予以支持。對持中原本位的改革者來說，唯有在台灣這當下的本土，現實上的中國力求改革，才能真正保有這僅存的「自由中國」，進而圖中國未來的統一。對國民黨來說，雖然改革會影響其政權，但不改革將連政權都無法維繫，所以也不得不忍痛擁抱改革。於是，在中國民族主義結合關懷本土現實的大潮流下，人們可以各取所需地把現實或本土理解成中國架構下的台灣，或主要指台灣而先將大陸放到括弧中，並共同在保護台灣這個前提下團結起來。如此一來，國民黨雖然沒有真地解決外部正當性的問題，卻能創造出讓被統治者相信現在必須凝聚內部力量一致對外的主動共識，成功地加強它內部的正當性。

所以，「革新保台」的論述能勝出，並不令人意外。在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使得國民黨遭遇到外部正當性危機，使得台灣內、外的安定變得不確定起來，令國民黨原有逕以外部正當性為內部正當性的法統論述喪失可信度與說服力，並暴露出法統論述不過是以普遍性的面具來維護統治集團的特殊利益的情況下，<sup>135</sup>「革新保台」的論述將中華民國的認同重新闡述為維護它在台灣的實質獨立，成功地將改革的特殊要求與保台的普遍要求結合起來，奪得正當化論述的領導權，使得人們相信「革新保台」是台灣人民當下共同追求的普遍目標，乃至對

---

<sup>133</sup> 相較於中國民族主義論述，「法統」雖同樣是國民黨優勢支配集團的論述，但以Bourdieu的概念來說，它只是官方的正統（orthodoxy），而未取得如「常識」（doxa）般的鞏固地位，被視為理所當然，受到潛在性（latency）的保護，不會被論題化。正因為常識的經驗本身不把自己視為信仰，所以它是個比所有信仰都還要來得深沈的信仰。見Pierre Bourdieu, *Practical Reas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 81；Crossley Nick, "On 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s: Bourdieu and the Socio-Analysis of Publics," in Nick Crossley and John M. Roberts, eds., *After Haberma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ublic Sphere* (Oxford: Blackwell, 2004), p. 101.

<sup>134</sup> 甚至還有不少人對統一抱有希望，所以雖然具備現代主權國家原則的認識，卻反對兩個中國的方案，像海浮子，〈再論中國的處境與我們應走的方向〉，《大學》，期59（1972），頁41-42，便說：「懷有對改善大陸同胞待遇負有責任與義務的主觀願望，便絕不可放棄對大陸的主權而自外於中國。因為只有你是中國的一份子，對大陸有主權，你纔有改變大陸現狀的權利和資格…一旦大陸有變，不獨蘇俄定會軍事干預，美國、日本將假名友好而插手其間。自由中國是接管那種局面的現成力量，我們不可妄自菲薄」。

<sup>135</sup> 陳少廷，〈再論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大學》，期49（1972），頁94，便說：「用改選把他們請下來，說是會斷絕『法統』，訂立退休制度，讓他們享受清福，就不會斷絕『法統』」。另外楊庸一，〈對當局與輿論界的強烈建議〉，頁14，也提到，「一面高叫全面團結，一面卻仍緊抓著既得利益而不放，這對大多數的人民來講是不公平的」。

它背後「反統一」的特殊蘊涵視而不見。也正由於《大學》成功地讓本是偶連的「革新保台」論述躍居常態典範的地位，所以儘管《大學》1972年1月刊載陳鼓應〈開放學生運動〉一文，<sup>136</sup>已觸犯了國民黨的大忌，令兩者的關係開始緊張，由結合走向摩擦，<sup>137</sup>國民黨還是不得不暫時維持雙方的結盟關係，而不致立刻對其動刀。

#### 四、後果：鎮壓中國民族主義

不過，跟任何奪得領導權的論述一樣，革新保台論述也是建立在壓抑其他聲音的基礎上。<sup>138</sup>如前述指出的，認同中共、「統一」論述，乃至（中國）民族主義，<sup>139</sup>隱然成爲取得領導地位的「革新保台」論述所要排除的「他者」，這尤其明顯表現在1972年底台大的民族主義論爭、王曉波所謂「台灣學生第一次公開的統獨論戰」中。<sup>140</sup>許信良在民族主義座談中便說，「歐洲現在有一種歐洲主義，趨向各國的統一。我認爲這種趨向太可怕了；歐洲小國要離開俄國也不易，因爲小國活不下去，或是活得不愉快。世界也有統一趨向，這也是可怕的現象」，意在弦外地用性質上迥然有別的歐洲區域統合來影射大陸與台灣的关系。代表官方立場的海工會主任陳裕清雖然重申「統一」是國家的目標，心力卻放在反駁海外流行的「統一三段論」（要中國強，且大陸強於台灣，所以台灣應併於大陸）上。就是說「統一非常好」的韋政通都同樣要質問「實際上的統一是什麼？」，

<sup>136</sup> 陳鼓應，〈開放學生運動〉，《大學》，期49（1972），頁64-68。

<sup>137</sup> 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收入南方朔，《自由主義的反思批判》（台北：風雲時代），頁134、160；張俊宏，《我的沈思與奮鬥》，頁34-35、第二章。

<sup>138</sup>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sup>139</sup> 這裡涉及一細微但關鍵的區別。就如前述，中國民族主義在當時仍是多數人無法跳脫的認識障礙，也是呼籲改革者尚不敢挑戰的框架。自外部正當性危機及保釣以來，掀起的也是中國民族主義的風潮。以葉洪生，〈二十年一覺飄花夢〉，頁36，的話來說，「不論這一代青年身屬何型，他們的愛國心是絕不可遽加懷疑的。中國人愛中國，是出諸本性，國難當頭之時，更應看得清楚才對」。因此，嚴格來說，革新保台論述所排除的只是民族主義，甚至只是認同中共的特定民族主義類型。然而，就中國民族主義是當時公共言論空間中唯一被容許的民族主義論述來說，視民族主義爲應排除的他者可以說就等於排除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不過，如論戰內容顯示的，反對民族主義的一方雖顯示出「反中國本位」的傾向，乃至隱隱有反中國民族主義的色彩，但並不敢挑戰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觀念，也不曾公開批判中國民族主義論述。

<sup>140</sup> 以下所述參見王曉波，〈釣運與台大「民族主義座談會」論戰－記第一次台大校園的統獨之爭〉，收入王曉波，《尚未完成的歷史：保釣二五年》，頁369-465；洪三雄，《烽火杜鵑城》，頁374-83；鄭鴻生，《青春之歌》，第八到十章。原文引用主要根據王曉波前揭文及楊庸一，《台大民族主義論戰》（彰化：新生，1973）。

並指毛共受馬列主義控制，「不是真的民族主義者」。<sup>141</sup>只有陳鼓應和王曉波持國民黨向來也擁護的民族主義立場，認為「民族主義是保衛國家利益的」，並對美、日展開嚴厲批判。

早在座談會之前，堯旋便已在《大學新聞》發出「究竟外國人壓迫我們厲害？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壓迫自己厲害？」的疑問。座談會後，胡主民延續視中共為當前頭號敵人的觀點主張，「的確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提倡民族主義是唯一的自救之道。但今日我們面對的不是黃髮碧眼盎格魯·撒克遜人，而是與我們同文同種，在共產獨裁或政治統治下的『中國人』。如單打著民族主義的大旗，不但不足以摧毀共產政權，更不足以自救自保」，指責「王曉波在座談會中只提反帝不談反共，另外有一位哲學研究所的學長只提反共而情願犧牲民主、自由，情願走向法西斯軍國主義之路」。

穆谷（孫慶餘）亦從革新保台的現實論立場表示，「民族主義，在從前，是就統一而完整的中國而言的；由於當時只有一個政府，所以並不造成扞格。然而，當時的國府現在正在台灣（並且是這次參加論戰雙方公認的唯一合法政府），他的『最大』敵人是竊據大陸的共匪，而共匪也在高談民族主義。因此，今天我們要談民族主義，必先求民族統一，要求民族統一，必先消滅共匪。我不知道共匪未消滅，還有什麼民族統一可言？民族未統一，還有什麼民族主義可言？…那些你想造成情感交流的『同胞』，正隨時可能在共匪的一聲令下血洗台灣；同時在世界各處默默進行孤立我們，打擊我們的，也正是這些『苦難同胞』。對於敵對雙方，勉強把『同胞』和『國家』分開來是沒有意義的…我們的責任是鞏固台灣，捍衛台灣，先使台灣一千五百萬人民不會成為『苦難同胞』後，再去營救大陸上那些『苦難同胞』；而不是為了認同『七億苦難同胞』，而使台灣再增加『一千五百萬苦難同胞』」。吹簫客更在《台大醫訊》發出直接且赤裸的攻擊：「當中共的統戰陰謀以民族主義做『羊頭』，在海外賣他的『狗肉』時…我們要問，你們如何讓各位同胞相信你們所販賣的民族主義不是統戰陰謀的台灣版，不是有奶的毒娘？」

由於民族主義已成了革新保台論述（至少暫時）要排除的聲音，所以論辯雙方實際上並不享有共通的語言。當持革新保台立場者視對岸的中國人為敵人時，主張民族主義的鄭鴻生、謝史朗和張錦焜則強調「同胞就是同胞，好的、壞的、燒成灰的，也都是同胞」。<sup>142</sup>一方認為，在敵對的情況下，把「同胞」與「國家」分開是無意義的幻想，但對另一方來說，區別中共「偽」政權與同為同胞的人民卻是不可放棄的民族大義所在，反共並不是反華。<sup>143</sup>一方主張「愛國必先反

---

<sup>141</sup> 另外，以擁護一個中國立場的海浮子來說，在主張「必須經由民主政治與民族主義兩途來團結國人」的同時，他也清楚地認識到，「民主與民族主義這兩件武器須分別對清目標使用。民主對毛共，民族對蘇俄」。海浮子，〈中國的現狀與我們應走的道路〉，頁21。

<sup>142</sup> 黃道琳更說把中共治下的中國人視為敵人的想法「比『台獨』分離思想更惡毒」，是把「台灣跟大陸的同胞分化成兩個對立的『民族』」，「非但沒什麼功能，甚至要趕盡殺絕」。

<sup>143</sup> 不過，當黃道琳抓到穆谷的語病，指責他怎麼把中華民國和「毛共政權」兩者都稱為「國家」（儘管

共」，另一方卻認為「愛國才能反共」。儘管主張民族主義的一方深知「反共與否」才是論爭的核心所在，故也不時表態反共，強調「要用真民族主義對抗紅匪的假民族主義」，可是在遭到攻擊後，「爲了自衛基本上也只能將民族主義抓得更緊，甚至抬出三民主義來當『護身符』」，或以「台獨分離思想」的帽子反擊，但終不免因堅持「民族主義的目的正是要求民族統一，民族未統一，不談民族主義談什麼？」而成爲特定時勢下的犧牲品。因爲雖然他們的說法可能是最符合以往國民黨口頭上所主張的，但在當時的局勢下，任何跟「統一」沾得上邊的在國民黨看來卻是此風不可長。<sup>144</sup>此所以公開鼓吹民族主義，按傳統標準來說是「愛國主義者」的台大學生如錢永祥、黃道琳，<sup>145</sup>或是曾公開表達對蔣經國有期望（這應跟蔣的留蘇經驗和曾有社會主義傾向有關）的王曉波和陳鼓應，反而成了國民黨率先整肅的對象。先是在1973年2月，這群師生分別遭警總約談，<sup>146</sup>繼而更爆發台大哲學系事件，黨國眼中的異議分子全遭解職。<sup>147</sup>在當時的兩難處境中，儘管國民黨深知這樣的整肅不免會造成離心的效果，但相對於確保政權當下的生存來說，它甚至寧可選擇先對在它眼中「具統一傾向」或可能導致統一趨勢的異議份子，而非傾向台獨者動刀。<sup>148</sup>

---

這的確是穆谷所立基的現實論會導出的結論），穆谷也不得不趕緊改口澄清，強調自己行文中的「同胞」與「國家」皆已加上引號，中共只是「偽」國家，以免因跨越紅線而慘遭整肅。較奇特的是，在穆谷發表反對文化高於政治，文化上的淵源可以解消政治分歧的看法，並舉美國的例子說明「國家先於民族的事實；對於獨立的美國而言，傳統英國式的民族主義已經不具有任何意涵」，因此被王曉波反駁是「引喻失義呢？還是逼急了以後終於露出狐狸尾巴？」，直指穆谷肯定的民族主義正是海外台獨的理論（見王曉波，《尚未完成的革命》，頁459），似未見穆谷回應，且穆谷亦未因此而遭整肅，可見國民黨當時應是鎖定這些民族主義者作爲首要打擊對象。

<sup>144</sup> 這一定程度反映在官方羅織的罪名上：老師被戴上「爲匪宣傳」的帽子，學生則是「傳閱匪書」。見鄭鴻生，《青春之歌》，頁269，註10。

<sup>145</sup> 但錢氏本人似未實際撰文參與論辯，而只曾在座談會中發言，尤其是斥責馮滬祥爲「職業學生」。不過，依鄭鴻生，《青春之歌》，頁213，的敘述，錢氏「有其個人魅力，即使沒什麼兵卒可用也足以稱尊」，亦是保釣時「就曾撐起過一面旗幟鮮明的民族主義反帝大纛」的大學論壇社那一群朋友實際上的頭頭。所以，民族主義的因素外，擔憂學生運動應也是國民黨鎮壓的重要因素之一。

<sup>146</sup> 根據陳少廷、陳達弘，《政治蒼蠅的嘴臉》，頁20，的說法，警總約談陳鼓應及錢永祥，是因為張俊宏帶「附匪學者」陳省身談訪匪感想的錄音帶給陳鼓應，陳再約學生來聽之故（亦見鄭鴻生，《青春之歌》，頁256）。在我看來，即便這屬實，也只是引發的緣由或逮人的藉口，雖難謂全無影響，但終非關鍵所在。

<sup>147</sup> 趙天儀編著，《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從陳鼓應與『職業學生』事件談起》（台北：花孩兒，1979）。

<sup>148</sup> 鄭鴻生在日後的追憶中認爲左／右才是當時的關鍵區分，並似乎認爲主張民族主義的學生是因其左翼色彩才遭鎮壓的（如見《青春之歌》，頁239），我卻覺得民族主義恐怕才是更關鍵的因素，如果再沾有任何「左」或「統」的色彩，就更難逃被整肅的命運了。就論辯的公開言辭來看，這群學生並未表現出特別鮮明的左翼立場，畢竟關懷現實與中下階層在當時進步的知識份子與學生中是大潮流，而且就台灣的特殊處境來說，光從「反霸」與否來區辨左右未必充分。鄭自己在書中也表示，

## 五、尾聲：歷史教訓便是沒有教訓？

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發現，其實歷史原本有其他的可能性，而不必然如此發展。可惜，在特定結構條件交錯與諸多事件系列的匯聚下，當時或最具批判色彩與左翼意識的一群青年不只淪為特定時勢下的犧牲者，台灣的政治發展也陰錯陽差地走向日益喪失自由度與可能性的窄路，不但錯過包含兩個中國選項在內之台灣獨立（自成一個國家）的機會，同時也失去了左翼的傳統，並慢慢地往激化族群政治之路邁進。

或許，如果當年這群左翼民族主義者唸的是法政社會科學而非修習文史哲（或理工科），對國家、民族、民族主義等有比較是從現實出發的理解的話，情況可能會有不同…。<sup>149</sup>或許，有太多的可能與或許。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或許是，歷史給人的教訓是，人們從來便不會從歷史中記取教訓。

---

對當年的他們來說，站一個反抗的位置遠比理念要來得重要。因此，雖然他們當時自居左翼，並且在受到1960年代全世界左翼思潮的衝擊後，自認已超越孫中山，但在陷入被扣上紅帽子的急切處境下，為了自衛只能將民族主義抓得更緊，乃至抬出三民主義當護身符。在當時的時空條件下，公開的主張與私下的實際想法有落差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如果自認是左派，為何會對被扣「紅」帽子極為「反感」，乃至在回應時出現對左派並無太多敬意的敘述：「以為我們是馬×斯他媽那狗腿子的信徒（…究竟你也是如我們一般，看不起人才用『馬×斯』來洩憤）」（見王曉波，《尚未完的革命》，頁434-35）。畢竟，左派雖會對被扣帽子反感，但應不至於一併對「紅」、「左」也反感吧？就是想掩飾自己的左翼色彩以求自保，在當時的條件限制下應當也還有其他論述策略的可能，真以左派自居者想來不太會用這種輕蔑自己「祖師爺」的方式來「洩憤」吧？不過，話說回來，在統治者的眼中，這群相對叛逆，且內部凝聚力極高，其親密性引人羨慕或側目的學生，可能正如鄭鴻生所說，「是當時台大學生中唯一露出鋒芒的左翼，雖然在民族主義論戰之前從未大張旗鼓宣示過左派理念，但顯然這種左翼氣質在學生活動分子中相當凸顯」。因此儘管他們「在思想與生活上的反主流，而經常陷入行動的困境，甚至連論壇社也辦不下去」，卻還是成了首先被鎖定的對象。

<sup>149</sup> 相對地，較被鎮壓的這群人年長許多輩，一定程度上對大陸更為眷戀的雷震，雖然同樣不想告別舊民族，但因為有法政的背景，以及在現實政治中打滾的經驗，所以在1970年代初便已認識到，唯有就地成立新國家（「台灣獨立」！），才是唯一的出路，見註78。